



谈炎记创始于1920年，主营特色风味水饺，誉为“中华名小吃”，2011年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老万成创始于1910年，主营酸梅汤，百年配方手工传承，2015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2022年第4期(总第354期)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蒨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郑雅飞

编辑：严濂 许濛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谈炎记续写“水饺传奇” / 丁建华
- 7 老万成为“火炉”送清凉 / 刘汉华

九城同心

- 12 咸宁历史文化简介 / 金顶挑
- 14 千年砖茶羊楼洞 / 冯晓光
- 19 诞生于通城的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 / 胡沙岸

三镇拾遗

- 24 1972：新洲倒水改道入江 / 李少武
- 29 汉阳老城访“旧学” / 施惠芳

目录

CONTENTS

委员天地

- 32 多重角色的文艺女兵
/毛志红(口述) 闻政 刘桂英(整理)
- 36 愿做青山的一根绿竹 /刘进波(口述) 郑雅飞(整理)

商聚汉皋

- 39 居人思客客思家 /张杰(口述) 严濂(整理)
- 43 趟出一条多元化发展之路 /顾枫(口述) 闻夕(整理)

史海钩沉

- 47 探寻蛇山历史深处 /董玉梅
- 55 金口槐山访名胜 /刘谦定

都市史话

- 60 “魏清记”营造建筑经典 /王钢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价：8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谈炎记续写“水饺传奇”

◇ 丁建华

【老字号小档案】

谈炎记创始于1920年，历经102个春秋，主营特色风味水饺，烹制考究，味系丰富，食之回味，余香满口，形成良好口碑。

谈炎记先后投资近百万元，进行大规模装修改造，并开设水饺馆样板店，成为拥有营业面积800平方米、员工70多名的国

有中型餐饮企业，集风味菜肴、特色水饺、名优新特小吃为一体。

谈炎记水饺荣获“中华名小吃”称号，公司荣获“中华餐饮名店”称号、2011年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2年，“谈炎记水饺制作技艺”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武汉谈炎记饮食有限公司（原武汉谈炎记水饺馆）位于汉口中山大道350号，创办于1920年，是历经百年春秋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久负盛名。经营的特色风味水饺，荣获“武汉市优质产品”和“武汉市著名商标”称号，由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华名小吃”证书。同时，公司也跻身“中华餐饮名店”行列。

“煨汤水饺”脱颖而出

1920年，湖北黄陂人谈祥志下汉口开作坊，经营小吃馄饨（武汉人俗称水饺）。

当时挑担卖的都是清汤水饺，谈祥志则采用上好的猪筒子骨和猪蹄、肉皮熬制原汤。为了与同行区别开来，他在夜间照明用的煤油灯罩上，写明“谈言记煨汤水饺”。“言”取和气生财之意。后来，谈祥志为图吉利，将“言”字改为“炎”字。“炎”字是两个火组成，以示火上加火，取生意兴隆之意。

这就是“谈炎记”招牌的由来。当时，有汉口竹枝词赞道：“谈记水饺响当当，皮薄味鲜赛鸡汤。老少咸宜价不贵，风味独特滋味长。”

1945年，谈祥志的儿子谈艮山在汉口利济巷（今利济南路）三曙街口，正式开设

谈炎记水饺馆。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74年迁入现址。

1986年到1992年，在市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谈炎记三次进行大规模装修改造，共投资近百万元，使老字号重焕青春，成为拥有营业面积800平方米、员工70多名，集风味菜肴、特色水饺、名优新特小吃为一体的国有中型餐饮企业。

1993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谈炎记利用经营场地，引进台商，开办了“台北斗牛士牛排快餐有限公司”，率先在硚口区商业系统引进外资，实现了零的突破。

“水饺大王”重整旗鼓

2000年9月，谈炎记率先实行企业整体改制，通过政府注入资产的方式，对企业职工实行分流安置，实现了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在此基础上，由原企业中的职工共同出资，组建民营企业——武汉谈炎记饮食有限公司。《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楚天都市报》《武汉晨报》等新闻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武汉电视台《都市茶座》栏目，由著名评书家何祚欢主讲评书段子，全面评说了谈炎记的创业历史。

同年9月在宁夏银川，国家经贸委、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第二届中华名小吃认定活动，谈炎记的“虾米香菇鲜肉水饺”荣获“中华名小吃”认定证书。

中国烹饪协会的品牌认定和鼓励政策，激励谈炎记重振旗鼓开拓进取。2001年9月，



利济北路东街的谈炎记店面

谈炎记投资20余万元开设谈炎记水饺馆样板店，开始了“水饺大王”的振兴之路。

样板店位于硚口区利济北路87号，根据公司的餐饮业标准化管理要求，样板店致力于严格管理、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保证质量，坚持顾客至上、持之以恒、坚持特色、创新品牌。开业迎宾三个月，平均日销售水饺504碗，平均月度营业额60000元。

实践证明，一个中华名小吃品牌，通过全新的商业策划和运作，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一定会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水饺文化”再添新彩

振兴老字号，从经济体制上寻找出路，不只是盘活一两个企业、保住一两个品牌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城市人文环境的问题。

谈炎记站在为历史文化名城添彩的高度上，努力让武汉市民重拾久别的“谈炎记水饺”记忆。为大力宣传谈炎记的传统技艺，弘扬汉味小吃精品的特色风味，2001年底武汉电视台《天生我才》栏目组，特邀“水饺大王”第三代传人丁志彬，录制了谈炎记

水饺制作过程的专题片播放。2002年5月，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栏目组也特邀丁志彬录制专题片，谈炎记水饺以形美、料真、皮薄、馅大、肉嫩、汤鲜、食之回味、余香满口的特色风味，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

“饺子”是怎么来的呢？传言古代夜间零时叫子时，新、旧年之交从子时开始，所以春节要吃除夕包好的饺子，取“岁更交子”之意，饺子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谈炎记特色水饺，每道工序严格按照传统工艺进行，从面皮、制馅、原汤、佐料到成品，都有精确标准，形成独家风格，使其成为荆楚美食苑中的一朵奇葩。

面皮：手工擀制而成，面筋质在擀制过程中得以充分舒展，从而降低面皮所含的食用碱。面要和上劲，条要出均匀，面皮薄如纸，四方都标准，抖动有精神，落锅不粘糊，吃起来爽滑而有“弹牙之感”。

馅子：由猪前腿肉与精牛肉按标准比例混合配制而成。因为牛肉吸水吸油，可使馅子爽口不腻，又使肉油浸渍到水饺皮上，以保持外观爽目，下锅后不破不烂，添在碗中随汤沉浮，犹如朵朵白莲，诱人食欲。

用汤：必须用纯筒子骨熬汤，水和骨控制一定比例，每天一次性加水煨好，中途决不另加清水，保持原汁原味。

烹制：严格掌握火候和水温，汤水要滚开，下锅要定份，火候掌握好，随时用勺拨，受热都均匀，皮馅要完好。

佐料：有猪油、食盐、香菇、虾米、香葱、榨菜、味精、胡椒、辣椒油等十余种。俗话说得好，“水饺不巧，佐料要好。”谈炎记的生意，几十年长盛不衰，全靠做工精细和佐料齐全。

经营品种：虾米香菇鲜肉、芹菜鲜肉、白菜鲜肉、蕨菜鲜肉、酸辣鲜肉、大葱鲜肉、

香菜鲜肉和鸡茸、牛肉、虾仁、什锦水饺等十几个品种，能适应不同消费层次顾客的口味。

2008年8月，谈炎记又投资30余万元改建水饺馆样板店，店址位于利济北路东街1号。营业面积由原来的71平方米扩大到95平方米，就餐座位由原来的38个增设为68个，布局合理，装修典雅，店堂宽敞，就餐舒适。同时，管理严格，操作规范，坚持标准，弘扬特色，以名、优、新、特的崭新面貌“再出江湖”。

经过十多年的拼搏进取，谈炎记水饺的特色风味不断发扬光大，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赞誉，成为汉味小吃精品中的一朵奇葩。品牌效应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2008年销售收入164万元，2017年销售收入316万元。

谈炎记在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效益也显著提高，荣获多种荣誉称号，2011年由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13年，“谈炎记水饺系列”评审为“中华老字号始创产品时尚创意”优秀产品，融入现代时尚生活。

丁建华，武汉谈炎记饮食有限公司董事长

老万成为“火炉”送清凉

◇ 刘汉华

【老字号小档案】

老万成创始于清末 1910 年，寓利润万倍增长的吉祥之意，在老武汉人眼中几与“酸梅汤”为同义词。

经过几代人创造与传承，老万成酸梅汤百年配方，原汁原味选料精，手工熬制微发酵，在武汉依然独一份。2019 年，“老

万成酸梅汤制作技艺”入选江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 年，老万成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百年坚守，品质如一。老万成近年开设多家品牌店，开发多种风味酸梅汤和秋冬热饮产品，满足市民的多方面需求。

清末民初，汉口开埠通商，华洋共处，新老商号林立。

1910 年，4 位河北商人抓住商机，勇闯大汉口，在繁华闹市中心的六渡桥，投资 9000 多大洋创办“老万成酒店”。

取名“老万成”，寓意利润以万倍增长。

开创百年品牌基石

武汉为“三大火炉”之一，入夏早，夏季长达 135 天，“秋老虎”威力大，酷热难耐。老万成起初主要经营烟酒，生意冷清，一位股东记起夏天曾在北京喝过的酸梅汤

酸甜可口、清凉祛暑，且武汉市面上没有商家卖过，提议夏天试制酸梅汤出售。

于是，传言清末当过御医的裴老先生，亲自研制酸梅汤，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成功研制出符合武汉人口味的酸梅汤。这就是我们老万成酸梅汤的第一代创始人。谁知，这一提议，竟然开创了一个百年品牌。

当年武汉没有其他消暑饮料，又从未喝过酸梅汤，所以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六渡桥一带商贾云集，人流量大。随着 1919 年民众乐园（当时叫“新市场”）开业，来此游玩的人更多，正处对门的老万成酸梅汤生意也随之越来越好，名声远播。



1970年代老万成门前排起长队

在“火炉”武汉，在那个冰箱还远远没有普及的年代，酸甜可口的酸梅汤，简直是酷暑中不可或缺的防暑降温饮料。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喝一口老万成酸梅汤，是老武汉人难以忘怀的酸爽和冰凉。在武汉人看来，“老万成”与“酸梅汤”就是一个意思——“老万成”就是做酸梅汤的。

酸梅汤古来即为上好的夏日饮品，清代经御膳房改进成为宫廷御用饮品，所谓“土贡梅煎”即是。因其除热送凉、安心痛、祛痰止咳、辟疫、生津止渴的功效，被誉为“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本草纲目》说：“梅实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它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甚至可以治咳嗽、痢疾及霍乱。神话小说《白蛇传》就写了“乌梅辟疫”的故事。

老万成的酸梅汤主要原料，就是乌梅、山楂、白砂糖等，营养价值很高，对于人体健康有着很好的功效。酸梅汤主要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维生素A等成分，具有开胃生津、刺激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适宜食欲欠佳者饮用。同

时，酸梅汤富含维生素B2，有利于防治口角炎、唇炎、舌炎等。它还有解暑、利尿、提神、抗疲劳等作用，能帮助肌肉和血管组织恢复活力。

虽然，老万成酸梅汤只在夏季出售，但名气却远远超过了主业烟酒。酸梅汤的火爆，带动了烟酒副食的销售，老万成度过了民国时期的风风雨雨。

传承古法配制秘方

1949年新中国成立，老万成酸梅汤制作技艺已经传至裴老之子裴广孚，也就是我的师傅，他成为老万成酸梅汤的第二代掌门人。

1972年10月，我成为老万成的职工，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由于身材健壮，干活踏实，勤奋好学，第二年夏天就和几位同事一起，分配到裴广孚师傅门下学习酸梅汤制作工艺。

裴师傅熬制酸梅汤的技术娴熟，酸梅汤酸甜适度，口感极佳，还经常受邀到北京、上海、南京去教授如何制作酸梅汤，店里也常常接纳外地学习酸梅汤制作的学员实习。

刚开始，都是师傅在配料室里把料配好，剩下的力气活，由我们这些徒弟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师傅传授工艺技术，既严厉又耐心，从配料、挑料、接水、添炭、点火到火候掌握，再到水开后，乌梅等原料投放的顺序、落缸温度，出缸时间计算等，都一遍一遍耐心指导。他常常叮嘱我们，在熬酸梅汤时要善于观察，注重酸梅汤的色香味，坚持用好的原料熬制，才能熬出好喝的原汁原味的酸梅汤。

虽然酸梅汤制作的工艺并不复杂，但也必须掌握好选料和火候。乌梅、山楂、白砂糖的配比与时机稍有差池，口味则大打折扣。山楂必须选取山东、山西的品种，其果实酸甜适度，口感绝佳。乌梅则选广东的，那里的梅子核小、肉厚，生津止渴。

我们老万成熬制酸梅汤，不添加香精、增稠剂、甜蜜素等，而且选用优质结晶白砂糖熬制而成。熬制时，先将乌梅投入烹煮，乌梅随水翻滚后，才能放入山楂，这样就可以避免肉质嫩的山楂煮老了。待熬到醇正的香味喷出后，再将乌梅、山楂过滤，将熬出的水投入白砂糖细细熬制，待蒸发出一半以上的水分之后，才能正式起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制作者不停搅动，稍一懈怠，要不就是山楂、乌梅糊了，要不就是白砂糖搭了锅，味道会受很大影响。

因此，火候掌握至关重要。尽管制作酸梅汤的手艺十天就可以学到手，但没有十年功夫，绝对谈不上炉火纯青。

老万成熬制出来的酸梅汤质地优良，汤色褐红，在光照下像红宝石光彩四射；梅子风味青涩甜香，醇香四溢；喝之入口先甜后酸，甜而不腻，酸而不涩，回味悠长。加之冰镇，一口下去心神爽悦。

正宗老万成酸梅汤好喝，就在于它是纯手工熬制和微发酵，完全采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熬制物料的次序有讲究，储放的时间有要求，这是与其他酸梅汤工艺不同的地方，奥妙也在其中。

畅销三镇声名远扬

1956年公私合营后，老万成更名为建新烟酒食品商店。1970年代，该

店实行24小时便民服务，被称为日夜商店，《长江日报》曾整版报道，一时成为汉口副食品店的标杆。建新副食品商店连同老万成酸梅汤红遍商界，其经验曾广为推介交流。

当年老万成酸梅汤的知名度非常高，以至于在物资紧俏的年代，制作酸梅汤的材料也是优先保证的。我记得当时只要有需求，就可以直接到市副食品公司业务科科长拿批条，去中药材公司领上好的山楂、乌梅。

每年5—9月，从凌晨开始，我和几个同事就开始轮班手工熬制酸梅汤，熬好的酸梅汤通过管道直送一楼，和食用冰搅拌冷冻。店子上午8点开门，晚上12点关门，每天卖出的酸梅汤能以吨计。特别是每晚9—10点钟，顾客蜂拥而至。当年没有空调、电扇的老武汉人，晚上都是摇着蒲扇在大街上纳凉，喝一杯冰凉的酸梅汤，成了最惬意的享受。

1970年代，酸梅汤3分钱一杯，一个队卖票，一个队发酸梅汤，排队的顾客能有几十米长。发酸梅汤的职工，常常发到手软，须2个小时轮换一次。装酸梅汤的玻璃杯，一收一大堆，洗都洗不过来。旺季一天可以



老万成第一代瓶装老味酸梅汁

卖出数万杯，浓缩酸梅膏一天也能卖上两三吨，日营业额可达2万元左右。

由于顾客很多，职工们照料不过来，常有顾客喝完酸梅汤顺手就把玻璃杯带走，几乎一个星期要买一大箱子几百个玻璃杯回来。后来请了一位退休的爹爹在门口看着，但由于顾客实在太多，仍旧看不过来，最后只好把玻璃杯换成便宜一些的瓷碗。

此间，建新副食商店为民服务的经验传为口碑，凭借其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地段优势、闻名遐迩的酸梅汤品牌，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响遍武汉三镇，名传湖北省内外。酸梅汤的生意很好，每月营业额达5—10万元。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每月可以卖出20—50万元。

历经千辛守住商标

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各样的饮料层出不穷，酸梅汤不再是武汉人消暑纳凉的唯一选择，对老万成的生意造成了巨大冲击。

市场上，除了可乐、橙汁等饮料严重影响酸梅汤的销售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了大量“老万成”同名产品，连超市都有许多“汉口老万城”酸梅汤膏，但都不是正宗“老万成”的产品。

由于“老万成”酸梅汤名声在外，产品不愁销路，多年来一直缺乏商标意识、品牌意识，商标被恶意抢注。1998年，建新副食商店推出瓶装“浓缩酸梅汁”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老万成”酸梅汤商标时，才被告知该名称已被浙江一饮料企业注册为商标。2003年，老万成再次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建新老万成”名称，被告知名称也在不久前被他人注册。

经历多次商标抢注事件后，我们才渐渐有了商标意识、品牌意识。通过打官司等各种方式维权，终于成功注册回“老万成”商标，守住这一百年老字号的商标。

革故鼎新继往开来

对于“老万成”酸梅汤的创新发展，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景泰杰则以“王老吉”为例，指出了我们传统产品发展之路。王老吉原来也只是广东等地摆在街边叫卖的祛火饮料，后通过营销策划，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已成为和可乐齐名的国内知名饮料。景泰杰认为，老万成酸梅汤也可聘请专家出谋策划，将传统手工业加工变成产业化经营，至于传统配方，同样可以用于现代化加工之中。

2003年老万成实行股份制改造，我正式成为老万成酸梅汤的第三代传人，担任总经理。作为改制后的企业负责人，我有义务让老万成重整旗鼓、发展起来，让百年“老万成酸梅汤”制作工艺后继有人、传承下去。

2017年，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克服困难，筹措资金，请来专业设计公司，对老万成的产品、店面等进行系统设计，让老万成的产品标签融合现代民国风，并针对口感、外包装等进行重新设计和调整，让举步维艰的老万成得到质的飞跃。

2018年11月，在吉庆街设立第一家品牌专营店。随后，相继设立汉口里、北湖、江汉路品牌直营店，并开通线上电商营销，打通了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模式。通过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模式，扩大客户群体，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认识老万成这一百年老店，体验老万成酸梅汤的制作技艺。



2019 老万成研发的第一代即饮产品

老万成长期以来只卖酸梅膏、汤，这是百年来一个主打产品，但产品的单一化及季节性等因素，严重制约了销售，秋冬季节成了店面最难熬的时期。我常常为此焦头烂额，不光是为了店面的销售还得为员工着想，销售业绩好员工才有盼头。

鉴于这种考虑，也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迎合现代人的口味需求，2018年我带领公司的研发团队，从市场调研、原料采购、工艺制作等方面着手，通过多方试验，终于研发出了适合秋冬饮用的枇杷秋梨膏。刚开始，销售不是很理想，后来通过“免费试喝”等促销手段，才让它被大众接受，立根市场，成为我们秋冬热饮的主打明星产品。

枇杷秋梨膏成功推向市场，并被广大市民认可，这启发了我，我就在想，我们的酸梅汤难道就只能做冷饮吗，能不能做成热饮呢？有想法我就去尝试，我虽已花甲之年，但对“老万成”的感情，让我充满了热情，想做事，想把“老万成”这个百年老字号发扬光大，想要传承想要发展想要创新。我得在尚有能时多尝试，没有想到这一试，

还试成功了。2019年研发成功后，率先在吉庆民俗街店铺推出了酸梅汤的热饮——姜汁酸梅汤、米酒酸梅汤、玫瑰酸梅汤等系列热饮，一经推出顾客反响也非常好。顾客尝试后都纷纷表示没有想到酸梅汤还能喝热的，热的酸梅汤口感也非常好，还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打破了酸梅汤只能喝冷的这一传统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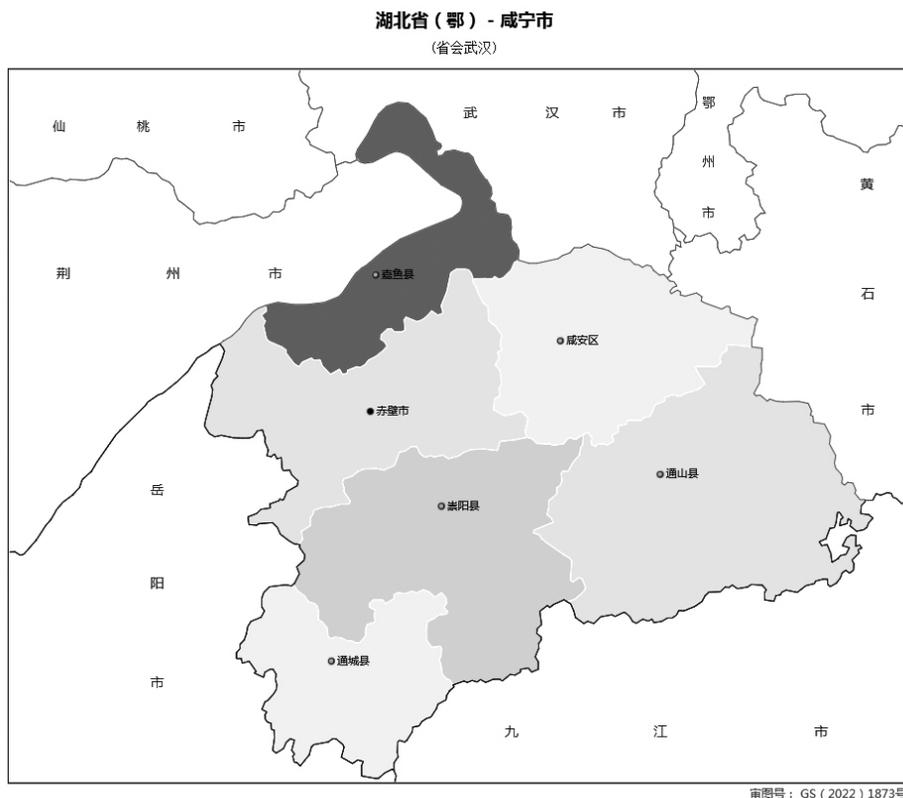
近年来，我们积极参与各类美食文化节、交流会、展销会及电视直播等活动，让广大市民多方面了解老万成酸梅汤“独门利器”，接触冷饮、热饮等多样化产品。同时，使之逐渐向湖北乃至全国辐射，向大家送去来自江城的一口清凉。

在时代的大浪潮下，老万成历久弥坚，坚守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创造更多更好的饮品，定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刘汉华，“老万成”第三代传承人，
武汉市江汉区老万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咸宁历史文化简介

◇ 金顶挑



265万。咸宁地处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矗立着九宫山、黄龙山、潜山等佛道名山，分布有陆水、淦水、富水、高桥河等通江河流，呈半开半闭通四方之势。在保持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苗越、荆楚、赣鄱、湖湘等文化因素交融积淀的多元文化层，获评中国汉族民间

叙事长歌之乡、中国古瑶文化之乡、中国嫦娥文化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提琴戏）、中国青砖茶之乡，孕育了李邕、冯京、魏观、

咸宁是湖北省辖地级市，武汉城市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成员之一。现辖1区1市4县，总面积10033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

李承箕、廖道南、朱廷立、刘景韶、雷以诚、米应生、余洪元、蔡辅卿、钱亦石、王世杰、袁贻瑾、八百壮士咸宁籍战士等历史文化名人。

差异发展话不同。咸宁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的足迹，通城尧家林文化作为新石器文化的一种类型，被写入考古教科书。境内县级行政机构始设于战国，地市级行政建置较晚，1965年成立咸宁专区，1998年设立地级咸宁市。由于各县长期分属江夏郡、鄂州、武昌府、兴国军等不同的行政区域，导致文化路径各不相同，方言便是佐证之一。咸宁大体流行赣方言，部分县市同时受湘方言、北方方言影响，各县市区方言自成一片、彼此不通，细分为“某某腔”或“某某话”，形成“方言岛”，保留有古老的入声字和古语词。

移民频仍古风存。历史上的咸宁是个不断填充的移民社会，经历了“江西填湖广”等多次族群迁徙。商周时期为古越文化区，战国时期楚人、越人混居。作为瑶族形成及迁徙历史上的重要一站，元以前汉瑶杂居，元末明初瑶民逐渐南迁后，“瑶田汉耕、瑶茶汉采、瑶药汉医、瑶俗汉袭”的文化形态存续至今。宋明以来，大量江西移民迁入境内，族源意识浓厚，聚族而居，兴建门楼，所题门匾往往反映族源、族史、族风、族训，堪称家族文化的密码。

万里茶道从此始。咸宁是湖北的传统茶区，明清时期曾是两湖茶业制造中心，境内通山杨芳林、咸安柏墩、赤壁羊楼洞、崇阳大沙坪是有名的茶叶古镇。茶风茶俗广泛体现在日常生活、婚嫁、祭祀和节庆中，形成众多茶故事、茶传说、茶诗茶歌、茶调茶戏。咸宁人培植茶树，建立茶园，制作砖茶，从赤壁羊楼洞出发，经由汉口转运，穿越中

原腹地、中国北方草原、蒙古高原，进入西伯利亚，延伸到莫斯科、圣彼得堡，联接欧洲，通过茶叶构筑起横跨亚欧的国际贸易商道，全长14000公里，被誉为“万里茶道”。

历史烟云风潮涌。咸宁素有“吴头楚尾”之称，在军事地理上乃东西咽喉、南北要冲，自古“用武者恒必由之”。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上，遗存有赤壁土城遗址、孙郭胡城址、吴楚雄关、天岳关等古城址、古关隘，曾发生赤壁之战、张昌兵败下隼、李自成殉难九宫山、钟人杰起义、北伐汀泗桥贺胜桥战役和鄂南秋收暴动等著名历史事件。1969年至1974年间，文化部还在咸宁向阳湖创办了全国文化名人最集中的五七干校，沈从文、冰心、萧乾、臧克家、杨伯峻、周汝昌、金冲及等文化名人及其家属6000人被下放到向阳湖，围湖造田，以锄为笔，留下一段段难忘的诗行。

香城泉都美名扬。境内溶洞众多，泉流密布，河湖纵横，古桥流水，盛产桂花、楠竹、茶叶、苎麻等。各县市区都有温泉分布，温泉文化自成特色。古桂数量、植桂面积、品种质量、鲜花产量等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尤其是古桂数量全国第一。桂乡人民爱桂花、种桂花、赏桂花、食桂花，将桂树定为市树、桂花命名为市花、《江南桂花香》定为市歌，建设桂花博物馆，传述嫦娥的传说，以守月华、中秋祭月等形式将桂花和月亮结合起来，形成了桂花文化体系。目前，正在奋力建设“中国桂花城”。

金顶挑，咸宁市群众艺术馆非遗保护
中心办公室主任

千年砖茶羊楼洞

◇ 冯晓光

羊楼洞茶区，包括鄂南蒲圻（今赤壁）、崇阳、通城、通山、咸宁、嘉鱼、大冶、阳新，湖南的临湘、平江，以及江西的修水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茶区。

赤壁羊楼洞，不仅是宋代茶马互市的重要茶源地，也是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源头，在古代边贸和中俄茶叶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里茶道作为茶马互市的延续和传承，承载了中国茶叶贸易的辉煌与沧桑。

羊楼洞青砖茶，抓住了万里茶道的发展机遇，产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经济流和茶交易额，成为万里茶道上共建互联、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

澶渊之盟：走进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是万里茶道形成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唐宋至明末，万里茶道形成的第一阶段，称为茶马（互市）古道，主要运销散茶和饼茶。

茶叶，历来是一种国家级战略资源。以茶叶交换蒙、藏、疆地区的马匹，以充国用，所以茶马互市可以影响国运的盛衰。同时，茶叶关乎边疆稳定，是朝廷以茶抚边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手段。因此，专供蒙、藏、疆等地区的茶叶，也称为边茶。

赤壁茶叶生产，早在唐代就被朝廷辟为“园户”。公元六世纪，茶叶就随着商人的驼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历经25年战乱之后，北宋和辽国终于缔结澶渊之盟，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贸易，内地与蒙古草原地区的茶马互市由此繁盛。

《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载：“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

中串之。”所谓“片茶”，系将茶叶蒸后压成饼状，即今青砖茶之雏形。

砖茶的产生，正是为了方便长途运输的需要。著名茶文化专家傅宏镇在《两湖茶业之史地研究》中记述：“宋元丰年间，西戎马市，尤以砖茶为主，而此种砖茶之制造，以湖广福建为策源地，即宋代宫中贡品之龙凤茶。”

《蒲圻志》载：“宋景德年间，（蒲圻）已有成批的茶叶运往边疆，在张家口与蒙古一带进行茶马交易。”河北《万全县志》也称：“宋代景德年中叶，官府以两湖饼茶与蒙古进行茶马交易，并以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

澶渊之盟让赤壁茶走进茶马互市，宋景德年间也是赤壁茶成为“边茶”有确切记载的开始。

中俄缔约：迈向万里茶道

明清之际，丝绸之路完全变成了“砖茶之路”，各国商队源源不断地将羊楼洞砖茶输往中亚和欧洲。

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至1853年，万里茶道形成第二阶段，称为“中俄茶叶之路”，主要运销的是饼茶、帽盒茶和砖茶。到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这条茶叶之路变得更加繁荣。

据《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大事记》载：清雍正五年（1727年），沙俄女皇派遣使臣来华申请通商，订立《恰克图条约》，中俄茶叶陆路贸易从此确立。晋商在恰克图中方一侧，迅即建立“买卖城”（贸易集市），把运抵的茶叶全部集中于此，俄



清末羊楼洞茶叶试验场初制加工

商也携货汇集到这里易茶。这样，恰克图就成了输俄茶叶的最大集散地。

其时，输俄的中国茶叶，除了功夫红茶，福建、浙江花茶，皖南绿茶，建德珠兰茶，还有鄂南的砖茶。由此可见，自1727年始，就有羊楼洞砖茶销往恰克图。

1939年《贸易半月刊》第1卷刊登的《羊楼洞砖茶之制造与运销》记载：“羊楼洞之茶，系指鄂南蒲圻、崇阳、通山、通城、咸宁等县以及湘北临湘一带所产之茶而言。羊楼洞初不过蒲圻县属之一小镇，东与崇阳、通山为邻，南距通城不及百里，西接湖南临湘，而地处中枢，制茶又早，故历为制茶中心。且以该地所产茶叶品质最佳，临近各地之茶，虽品质较逊，且不在羊楼洞制造，然亦假借其名，以广招徕，积沿迄今，因以成名。”

清末民初，是万里茶道形成的第三个阶段，称为“亚欧万里茶道”，这个时期主要运销的是青砖茶和米砖茶。米砖是以红茶的片末茶为原料蒸压而成的一种红砖茶。其洒面及里茶均用茶末，故称米砖。

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在羊楼

洞设立厘金专局，在周边产茶县镇设有柏墩、通山、崇阳、岛口、杨芳林 5 个分局，并在马桥、新店、富有、虾蟆岭、沙坪等运销节点上设有 5 个分卡。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羊楼洞砖茶是蒙藏边民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西北高寒，多以肉食。“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动物脂肪分解，而且可以补充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羊楼洞砖茶以其独特的作用和功效，成为西北各族人民生活必需品，被誉为万里茶道上的“生命之茶”。

格局逆转：跃为重要源头

羊楼洞与武夷山，作为万里茶道的代表性源头，没有时间的先后，只有区位的差异。

早期，武夷山茶叶品类与数量相对突出一些，名气也比羊楼洞大一些。清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占领南京，武夷山茶路中断，这种格局发生逆转。闽地的晋商进一步开辟两湖交界处羊楼洞和羊楼司的茶山，因此羊楼洞取代武夷山成为最重要、最兴盛的万里茶道源头。



绥远五原县乌拉忽洞村附近砖茶商人设帐帷投宿

榆次常家后人常士宣、常崇娟著《万里茶路话常家》记载：“以闽西北和两湖之交的羊楼洞的具体情况相比较，从地理位置来看，两地相距甚远，但有许多相近之处，都适于茶叶的种植。两湖茶山的最终确立，不仅使晋商及常家的茶商们获得了一个更为可靠的茶源，同时也使原有的行程缩短千里之多，贩茶的利润更加可观而丰厚。”

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记述：“1853 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 5 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 600 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1855 年，运往恰克图供应集市的茶叶不下 112000 箱。”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正好印证了中俄茶叶贸易确实受到茶道源头变迁的影响。

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俄商巴提耶夫、巴洛夫兄弟深入羊楼洞等地，开设阜昌茶庄。清同治二年（1863 年），俄商李特维诺夫来华投资，在羊楼洞兴办顺丰砖茶厂。他们改良砖茶的压制方法，拉来德国蒸汽机火车头，一番拆卸拼装后，蒸汽机部分用于蒸茶和烘茶，动力设备用于压制砖茶。

这一举动，开创了近代第一个茶业工厂，成为湖北近代工业的重要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制茶业之始。随后几年，俄商又先后在羊楼洞开设了“阜昌”“新泰”等 8 家砖茶厂。

俄商在羊楼洞设庄建厂，制售砖茶，由于享受茶叶半税待遇，又是水陆并运，大大节省了费用，

运销量从同治四年（1865年）的165万磅，猛增到同治六年（1867年）的866万磅。

俄商在羊楼洞的时期，也是羊楼洞茶业的鼎盛期，烟囱林立，车水马龙，常住人口达4万多，从业人员近2万。羊楼洞只是湘鄂边界的一个小镇，却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它的曝光率、知名度及“国际范”元素超过了县城，超过了州府，甚至超过了某些省会城市。

俄国人沿着这条由晋商开辟的万里茶道不断深入，直捣中国腹地茶区。1874年《万国公报》报道：“前俄国派来九人由西陲买卖镇启行，驰赴北京领取路凭之后，由天津到上海，顺达汉口汉水察看茶叶市面，即由内地勘觅运茶路径……，据传九人中武职二员，医士一名，军士三名，照像一人，通事二人云。”光绪元年（1875年），俄国人思诺福斯齐等人为开辟肃州（嘉峪关）茶路到羊楼洞考察，寻找新的有利可图的贩运途径。

以羊楼洞为源头，万里茶道形成了一条便捷的陆上线路。

羊楼洞砖茶由鸡公车推到赵李桥，再送上潘河的茶船到新店，顺长江至汉口，逆汉水至襄阳，换畜驮车至黄河。一路走西口（今内蒙古包头），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木图进入中亚和欧洲；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往北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后到达俄罗斯恰克图，由此转口销往俄罗斯及欧洲。

这一条茶道，较湖南安化起点，缩短近700里；较福建崇安起点，缩短1170余里。



砖茶驼队行走在大漠中

除了陆路，羊楼洞砖茶还由海上茶叶之路运销至俄国。1902年《鹭江报》第10期刊登的《茶运改途》记载：“茶叶出口为中国之一大宗，向来红绿各茶自汉口装船运至俄国雅克资克者每年约三四十万箱，概从汉口经天津出居庸关过张家口、库伦直抵俄境道路甚遥，运费颇巨，此中国之茶所以不能畅售也，近来汉口各茶商另立新议，日后茶运改由长江出渤海至大连湾趁东华铁路越黑龙江抵雅克资克，已与东华铁路定约每箱纳费二卢布，如此变通将来茶业或可振兴，不似前此之窒塞也。”

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修通后，海路加陆路的茶叶运输更为便利。羊楼洞砖茶由汉口周转，船运至上海或天津，再运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经西伯利亚铁路运到俄国及欧洲。

由于铁路的修建，陆路的运输形式也不断变化。1905年北京至张家口铁路修通，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1916年粤汉铁路蒲圻段建成，1921年张家口至包头铁路修通。铁路线越长，陆路运茶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成本越低。鸡公车、牛车、骆驼等传统运输工具，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万里茶道重要源头羊楼洞古街

联合申遗：融入一带一路

2012年，国家文物局召集湖北省等相关8省（区）文物管理部门，首次在赤壁市召开万里茶道申遗座谈会，发出《赤壁宣言》。

赤壁羊楼洞，被国际茶叶委员会认定为“万里茶道源头”和“世界茶业第一古镇”，纳入万里茶道申遗的预备名单，主要源于它还是青砖茶的发源地和原产地。

赤壁青砖茶作为“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湖北省重要公共品牌，在万里茶道申遗的进程中，进一步走向复兴。赤壁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赤壁羊楼洞砖茶文化系统，进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行列。2015国际茶业大会、2019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2020和2021一带一路·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相继在赤壁召开。

2014年6月23日，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携带以“和”为主题的青砖茶，参加长江上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

邦区领导人座谈会，并作为国礼由国务委员杨洁篪赠送给俄罗斯总统的全权代表巴比奇。

2016年3月，泰国公主诗琳通接受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的赤壁青砖茶礼品。2018年和2021年，赤壁青砖茶两次亮相外交部蓝色大厅，由外交部向全球推介。2018年11月18日，赤壁市乾泰恒茶业20吨青砖茶装车发货，销往俄罗斯。

2019年8月，赤壁青砖茶确定为“世界军人运动会”指定用茶。2020年，蒙古国捐赠湖北省3万只羊，而赤壁青砖茶定为回礼。

步入新时代，赤壁青砖茶传承创新、开拓进取。加强茶旅融合建设，将茶镇茶乡、茶园茶企建成旅游景区，将茶产品开发成旅游产品，将茶民俗、茶文化打造成特色旅游品牌，以茶促文旅，以文旅兴茶，推动茶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多产业互动发展。

“十四五”期间，赤壁青砖茶全产业链年综合产值力争达到300亿元。积极融入“一带一路”，融入万里茶道文化和经贸交流，以茶为媒，推动沿线国家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为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再创茶业强国辉煌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冯晓光，中国商业史学会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赤壁青砖茶研究院执行院长

诞生于通城的全国首个县级红色政权

◇ 胡沙岸

通城县地处湖北省东南端，鄂、湘、赣三省交界处，境内山川纵横，关隘众多，因地势险要，地理位置独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95年前，这里暴发了著名的“八二〇”秋暴，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这是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最早期实践和尝试。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我军政治工作奠基人罗荣桓，作为这次秋暴的直接领导人，就是从这里开启革命生涯的。

罗荣桓来到鄂南通城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分共”和“清党”，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

作至此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同时酝酿发动湘鄂赣粤4省秋收起义。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气氛之下，7月下旬，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正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的共产党员罗荣桓，以省农协特派员身份到达通城，开始秋暴的准备工作。

当时，通城县群众革命基础较好。以赵世当等共产党员为首的通城县委，在当地开展镇压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减租减息的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到1927年春天，通城农协会员发展到2万余人，工会会员有6000多人。

更为有利的是，时任通城县县长王武扬（安徽祁门人），在黄埔军校二期学习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一五”政变后，通城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正不知如何开展工作。罗荣桓的到来，犹如黑夜里点

燃了指路明灯。王武扬与罗荣桓接上头后，大喜过望，马上指派中共党员、县政府民政股长谭梓生，陪同罗荣桓到通城九岭，找到中共党员徐子恢，然后一行3人来到马港桥背屋，与通城县委赵世当、汪玉堂、朱春山等会合。罗荣桓传达了省委准备农民暴动的指示，几个人就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发动暴动进行了讨论。

8月中旬，成立不久的鄂南特别委员会派人到通城，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北省委《鄂南农民暴动计划》，要求通城9月10日以前举行起义，建立农民协会政权。

为此，罗荣桓与通城县委多次召开会议，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成立通城县暴动委员会，由罗荣桓、刘基宋、黄云岸等人组织农民自卫军进行训练，从农民革命军中挑选300名精壮骨干，配备200多支枪，由黄云岸带领秘密驻扎在县城外，随时准备行动。

其时，通城县城没有正规军队驻守，但要“拿下”县城并非易事。驻守县城的五区团防局团总刘秀波十分谨慎，他见通城农民运动和农民自卫军发展势头迅猛，将大部分兵力收缩到县城，依托旧式城墙，严防死

守：白天，县城四门他只开北门一条窄门，供行人出入，严密盘查；太阳一下山，四个城门上锁，同时加强街道巡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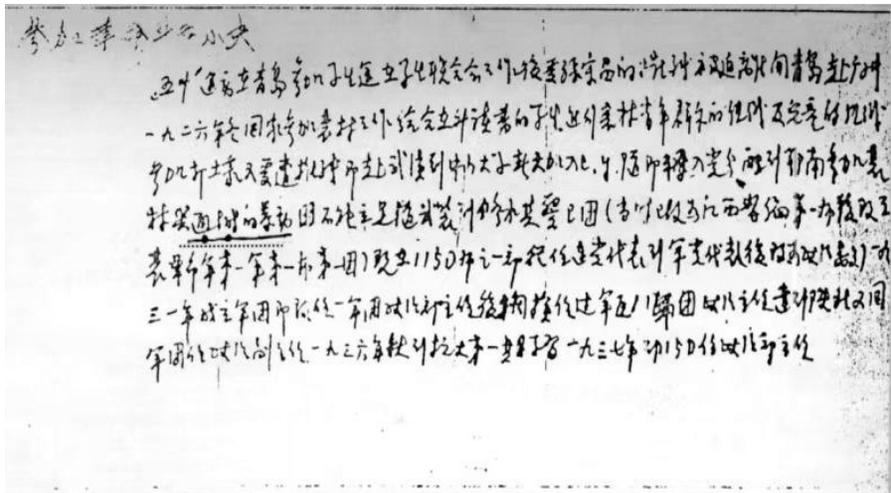
农民自卫军当时既无重武器，又缺少训练，如强攻县城，必然带来重大伤亡。正在这时，一个意外情况改变了暴动进程。

计开城门智取县城

在通城农军准备暴动的同时，邻县的崇阳农军也在积极准备暴动。8月13日，崇阳洪下农协得到情报，大地主陈余庆有一艘装满大米的货船将于14日从洪下运往武汉，船上有武装押运。农军决定截击货船，赈济乡民。第二天凌晨，中共党员、时任崇阳团防局局长的叶重开，率领崇阳农军在洪下天井窝袭击地主货船，消灭地主武装10余人，缴获大米40余包，步枪5支。

洪下截击成功后，国民党13军方鼎英部前往“围剿”。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崇阳农军80余人，根据湖北省委“有枪的同志能上广东的去广东”的指示，意欲南去广东。当崇阳农军到达与通城搭界的星桥白马铺时，打听到通城县县长王武扬是中共党员，即派人联络上王武扬。

王武扬闻讯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向罗荣桓等人通报了情况。罗荣桓等人研究认为，崇阳农军的到来，是实施通城暴动的最好时机。8月18日晚上，通城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崇阳县农军领导在县城外



罗荣桓 1938 年在履历表上亲笔填写的革命斗争小史

的一处秘密地点，召开联席会议。会上，罗荣桓等人认为，通城农军举行暴动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崇阳农军的到来，有利于通城实施暴动，遂决定将暴动日期提前到8月20日，并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1927年8月20日上午7时多，叶重开身穿团防局长军服，斜挂武装带，身背驳壳枪，脚蹬高筒马靴，骑着大洋马，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一名由农军战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县城拱北门，令人擂打城门，大声嚷叫着要见通城县团防局的刘团总。

守卫兵丁见是个当官的，不敢怠慢，将城门打开一道缝，放叶重开等人进城。叶重开递上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佯称抓到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哨信以为真，叶重开带着十几名卫兵直奔县衙门。早已在县衙门等待的王武扬看到叶重开已到，便一挥手势，早有准备的刘基宋、谭梓生随即猛吹哨子，先一步潜进

城里黄云岸和叶重开率领的农军，一齐迅猛扑向团防局，生擒反动团总刘秀波，包围了正在用早餐的全部团丁，没费一枪一弹，缴获步枪200余支，子弹10余担。

此时，两县农军的红旗插上通城城头，宣告八七会议后湘鄂赣粤4省首次农民暴动取得成功。

早期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劳农政府

8月20日下午，王武扬在县衙前主持召开大会，宣告通城秋暴取得成功、正式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组建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简称通崇农军），同时宣布了劳农政府和通崇农军的领导人名单。通城县劳农政府主席为省农协特派员朱春山，谭梓生、黄子端任副主席，汪玉棠任秘书长；通崇农军指挥人员为：总指挥王武扬，党代表罗荣桓，总参谋长刘基宋，军需长王嘉瑞。下辖两个



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

大队：一大队为通城农民自卫军，300余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农协骨干，大队长肖力，政治指导员王文安；二大队以崇阳农民自卫军为基础，将自愿留下的原通城团防局团丁编入，共200余人枪，大队长叶重开。会后，处决了反动团防局长刘秀波。

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后，立即与县暴动委员会、通崇农军领导人分工负责开展工作。赵世当、黄子端、黄云岸等在各区、乡成立区、乡农民政权，领导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王武扬、罗荣桓、谭梓生、刘基宋、叶重开等抓紧农民自卫军的训练；原在汉阳兵工厂做工的梅树基负责指导整修枪械，朱春山主管县劳农政府及负责筹集粮款。

在极短的时间内，劳农政府组织全县各区、乡农协选举产生区、乡劳农政府，并选出主席、副主席；销毁地主的账本、契约、账簿，组织民众抗租抗税，取消高利贷，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以充军饷；整修枪械200余支，打造梭镖1000余支，大刀600余把，土枪200余支。组织训练通崇农军和各区、乡农民自卫队，把守县境各交通要道，维持地方秩序。

8月下旬，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得知通城“暴乱”（即指通城“八二〇”暴动）后，立即委派反共分子毕振英为通城县县长。毕振英迅速勾结外逃的通城土豪劣绅和崇阳地主武装，不断对通城进行骚扰和攻击。与此同时，国民党13军陈嘉佑率115、116团为接应毕振英民团，也疯狂地向通城扑来，意在消灭通城县劳农政府和农军。

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鄂

南特委派符向一于8月底到达通城，意欲调遣通崇农军北上，参加9月9日将要举行的鄂南秋收暴动。罗荣桓、王武扬等领导人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当时国民党军13军115、116团和后期到达的117团，已从南、西、北对通城形成三面夹击之势，加上夏斗寅的23军独立1团、2团和敌岳森部1个师正由南往北扑向鄂南特委所在地，区区数百名未经正规训练的通崇农军北上，必然迎头遭遇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围歼，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何去何从？是摆在罗荣桓等农军领导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汇入秋收起义的洪流

唯一的空隙是向东行动。东边，与通城接壤的江西修水，当时驻扎有共产党员余洒度的部队。此人是王武扬黄埔二期同学，交谊不浅。

显然，东进修水，仅50里路程，较易成功。经过周密计划，通城县委、县劳农政



通城县劳农政府纪念碑

府和通崇农军总指挥部毅然决定由罗荣桓、汪玉棠等率通崇农军主力和县劳农政府主要组成人员向江西修水转移。

9月4日凌晨，罗荣桓等率通崇农军及通城劳农政府组成人员共600余人枪出县城向修水转移。当晚，部队夜宿距县城40里的麦市。5日拂晓，尾随而来的国民党13军部队与崇阳魏祥志地主武装将麦市包围。因天降暴雨，四周一片昏暗，加之地形不熟，一场激战后，罗荣桓等指挥战士们向东南方向突围，率领剩下的160多人继续向修水行进，到达修水路口，与余洒度师长派来的接应部队会合。7日傍晚，通崇农军成功到达修水县城。

次日，余洒度将通崇农军编为江西省防军第1师师部特务连。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特务连，罗荣桓任党代表，谭希林任连长，叶重开任副连长。这支队伍随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通城“八二〇”暴动，距八七会议仅隔13天。通城县劳农政府是八七会议后全国最早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是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以枪杆子夺取政权和建立工农政权总方针的一次早期实践和尝试，吹响了鄂湘赣粤四省暴动的冲锋号。

通城秋暴失败后，罗荣桓带领队伍汇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洪流，成为可靠的生力军。罗荣桓和毛泽东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此相识相知，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



2014年，罗荣桓元帅之子、第二炮兵原副政委罗东进将军（左）参观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

1963年12月，罗荣桓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共和国元帅三鞠躬。毛泽东此后几天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中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深切地表达了一代伟人对罗荣桓的信赖、依重和惋惜之情。

2018年6月，罗荣桓元帅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第二炮兵原副政委罗东进将军在参观通城秋收暴动纪念馆后感言：“我父亲罗荣桓的军事生涯是从通城起步的。”

通城秋暴及随后建立的通城县劳农政府，将永远照耀史册。

（此文依据相关史料整理编撰。）

胡沙岸，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书局
副总编

1972：新洲倒水改道入江

◇ 李少武

倒水是武汉市新洲区的三大河流之一，发源于大别山南麓的河南省新县庆儿沟，经湖北省红安县流入新洲境内，全长163公里，流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倒水流域有长度达5公里以上的支流72条，分布于河南新县和湖北红安县、大悟县以及新洲区，其中长20公里以上的支流有6条。

清朝时期，倒水干流西汇，经七湖到龙口进入长江。后因龙口入江处堵塞，倒水便在涨渡湖区泛流，由鹅公颈注江。由此，每遇洪汛江水倒灌，往往造成大面积水灾。

尽管历代治理，未能根除隐患。直到197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高度重视下，湖北省及黄冈地区组织倒水治理工程会战，最终拴住了“牛鼻子”，倒水河胜利改道入江。

倒水倒灌，“死水袋子”洪灾连年

涨渡湖是新洲的第一大湖泊，因“涨水为渡、落水为湖”而得名，由主湖和17

个子湖组成。涨渡湖区濒临长江，中间仅隔着一狭长的“双柳地”，南受长江倒灌，北纳举水、倒水流域6371平方公里的来水，历来是“汛期一湖水，枯水一片荒”。

“汛期一湖水”，即当水位上升到海拔22米高程时，涨渡湖区水面积达到255平方公里，合38万余亩。这时，主湖、子湖连成一片，浩淼不分。

“枯水一片荒”，即当水位下降到海拔19米以下时，涨渡湖区主湖、子湖星罗棋布，界限分明，水面约13万亩。其余面积均为草场、湖地、河港、泥滩。

每到汛期，江水倒灌，涨渡湖大闸必须关闭，而汹涌澎湃的倒水只能全部流进涨渡湖这个“死水袋子”，造成湖区及周边大面积被淹。若遇多水年份，下游湖水顶托，上游水流不畅，则会造成倒水河堤溃口，出现打圩，淹没农田村庄，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形成严重威胁。

有关的水灾记载，以清道光年间最为严重。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三十年（1850

年)，倒水流域连续发生9次水灾，其中大灾5次。当地民谣曰：“道光，道光，十年九荒”；“生命由天管，十年九不收”。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倒水流域曾发生大小水灾20余次，其中以1931年为最重。这年，沿江堤顶全部淹没，内湖堤圩共溃口120多处，新洲一半以上版图面积成为泽国，河湖田地白茫茫一片，受灾人口达30万之众，冲倒房屋5000多幢，几万人流离失所，外出逃荒。

位于倒水河附近的孔埠区王家泊村，地势较低，常遭洪水淹没。解放前，当地流传着一首悲惨歌谣：“王家泊，王家泊，只见插秧不见割。十年就有九年淹，外出逃荒无下落。”

解放后，1949年至1955年，倒水下游仍然连年遭受水灾，其中1954年和1955年为特大洪水，两岸围堤围垸大都溃决，群众苦不堪言。

倒水治理，历经艰辛水患不绝

面对倒水日益严重的洪涝灾害，从明代开始，历代都想尽各种办法对付倒水。明正德年间，黄冈知县简霄，最先在举水、倒水下游中间地带，修了一系列堤坝，以保护农田不遭水淹。清代，黄冈县府在举水、倒水下游及涨渡湖沿岸修了许多排水涵闸，排泄河湖洪水。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大小圩堤发展到120余条，1922年湖乡绅民又修了沿江干堤及鹅公颈、罗家沟大闸。但由于修堤建闸，堵死了鹅公颈口，加之设计不善，闸底过高，宣泄不畅，造成

河湖淤压，年复一年，群众又蒙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后，治理倒水的力度不断加大。1949年冬，黄冈专署副专员漆少川，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亲自指挥挖开了鹅公颈老河，让内湖河水直接入江，因而减轻了举、倒二水的危害。但江水倒灌问题，一时仍未解决。

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决定兴建涨渡湖蓄洪垦殖工程，数万人用了两个冬春，筑起了长38.7公里的举西大堤，隔断了举水进入涨渡湖，但倒水入湖问题还是难以解决。为减少倒水对湖区的危害，1954年夏，在长江干堤挖沟段建成了四孔4米高、4米宽、排水流量为每秒240立方米的排水闸，以排泄进入涨渡湖的倒水。

1955年冬至1956年春，经湖北省水利厅批准并投资，对倒水下游堤防实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治。

倒水堤防连年溃决的原因：一是李集以下的河道弯曲；二是铁牛矶处滩高三米多，严重阻水；三是涂家湾以上的河宽仅160米，且各弯曲段都是进口大于出口，洪峰壅涌难行，致使自回龙畈与铁牛矶以下圩垸常常是先漫后决。这次整治主要是裁弯取



1970年6月倒水治理工程开工誓师大会

直、堵支强干、展宽河床。共堵死铁牛矶、双河口支流二条；由铁牛矶至孙占埠大范围退挽；自孙占埠至院子垮重建一段新堤，全长 15.5 公里，堤顶高程 28.5 米；对孙占埠以上的老堤，普遍加高培厚，使堤顶高程达到 29 米。此次工程，共完成土方 186.6 万方，标工 94.2 万个，耗资百万元。

1959 年至 1960 年，在倒水上游红安县境内建成蓄水一亿立方米的金沙河水库，拦截了部分下泄山洪。1969 年，在举西堤下段兴建了沐家泾排水闸，排泄倒水洪水，排水流量为每秒 300 立方米。

然而，历代对倒水和涨渡湖的整治，由于倒水未能撇除，涨渡湖还是成了“死水袋子”，遇上多水年份，灾害仍然极其严重。

倒水流入涨渡湖，不仅给湖区人民带来严重的水灾，还使湖区产生了大面积钉螺，而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涨渡湖滨湖地带，历史上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疫区。

因此，新洲人民迫切要求撇除倒水，根除涨渡湖水患，送走“瘟神”。

倒水改道，世代愿望一举实现

倒水下游改道工程，是涨渡湖的治本工程。

从 1953 年至 1958 年，新洲县水利局每年都成立以副局长刘琨为首的倒水下游改道工程勘测小组，先后进行过 6 次实地勘察，拟出了 5 个规划方案，但最终都因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原因，未能通过上级批准。

1958 年 5 月，湖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



1979 年 5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左四）、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前右二）、黄冈地委书记丁凤英（左三）等领导视察改道后的倒水河

院奉命开始对倒水下游改道工程进行勘测设计，随之编制了《倒水流域规划草案》。该《草案》强调：“要彻底解决涨渡湖的渍水、洪水问题，必须撇除倒水，使其不入涨渡湖。”

《草案》对改道线路作了如下概述：“倒水改道方案大致可分三类：直接入江方案；举（水）、倒（水）合并方案；入武湖方案。其中入武湖方案不可能，因为‘长办’已提出对武湖实行一般年垦殖、大水年分洪的规划。故只能就直接入江方案和举、倒合并方案，作出比较。”

直接入江方案有两条线路：第一条是河流通过涨渡湖边，走李家大垮入江。此线路主要问题是地势极低，堤防甚多，两面受水，防汛抢险极其困难。第二条线路是河流穿过韩弄坳、王店坳，走龙口坳入江。《草案》经过比较，认为这条线路是所有方案中可行的主要方案，并对此线路作出了水力演算和说明，拟定了工程措施，计算了效益、投资、损失及工程数量，提出了待研究的问题。

新洲县主要领导以求务实的精神，带领各区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走向倒水

流域，沿途跋山涉水，勘察线路。经过多次深入群众，多次座谈访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两条线路进行了反复比较，认为各有优劣。

李家大垮入江这条线，土石方少，工程量小，但要在水中筑两条十六里长的河堤，不便于施工，并且堤基不稳，汛期危险性较大；龙口坳入江这条线，主要走丘陵地带，要穿过四个山坳，土石方多，工程艰巨，但基础好，出口好。虽然这条线也要穿过四个湖泊，但水中堤线相比之下较短，今后防汛任务小，便于配套受益。大家通过反复讨论后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第二条线路符合科学发展要求。选线路一定要从长远利益出发，不能图眼前省工而带来后患。

1958年9月，黄冈地区在黄州召开水利会议，对新洲县提出的倒水改道问题和湖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编制的《倒水流域规划草案》进行了大会审议，但因投资太大，力不能及，未敢定论，最后拟报请湖北省水利厅定案。省厅从长远建设考虑，暂未批准。此后几年，新洲县人民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鉴于倒水由龙口入江方案工费巨大，又先后提出倒水由四道沟入举水、由李家大垮入江、由柴泊湖入江等5个方案。这些方案多为勉强求合，均被搁置，未予审议。

倒水改道问题一拖就是10多年，一直难以解决。

1969年，新洲全年降雨1824.2毫米，其中7月连降大雨、暴雨长达10天，雨量达721.5毫米。举水、倒水、沙河三大河流的上游麻城、红安等县地段，亦同时普降大雨、暴雨。倒水李集水位高达30.44米，通过洪峰流量每秒3490立方米。倒水、沙

河堤防受上游洪水影响，全部溃决，涨渡湖区及新洲大部分地区，淹成一片白茫茫。全县淹倒房屋48979间，冲毁桥梁110座，死伤389人。

黄冈军分区政委董复汉、副政委李晓祥亲临新洲，组织一百多艘大小船只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中共湖北省委和省防汛指挥部收到黄冈军分区发出的新洲洪灾告急电后，立即派出多架飞机飞来灾区，空投大批救生衣、食品及其他赈灾救济物资。

大灾期盼大治。由此，新洲人民对根治倒水的要求更加强烈，盼望着倒水下游改道工程尽快实施。

阳光总在风雨后。倒水改道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0年1月24日至2月16日，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四楼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当周恩来总理得知新洲因为倒水问题遭



中共黄冈地委书记、黄冈军分区政委董复汉（中）研究倒水治理方案



倒水治理工程庆功表模大会

了大水灾，导致棉花减产时，立即对新洲代表说：“苦战两年，解决倒水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碰头会上，再次就新洲的倒水治理问题作了指示。李先念还特别督促湖北省领队李衍授（湖北省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兼农林水组组长）说：“你那个倒水要逼上去呀！”李衍授回答：“我们回去研究解决。”

1970年4月16日，新洲县委向黄冈地区及湖北省呈送了《关于呈请批准倒水治理工程的报告》。有关工程改道线路，《报告》中提出：自倒水下游张旗牌起，经胡汉咀、王家河头，穿韩弄湾大坳，过陶家大湖，再穿王家店坳，进鄢家湖，至龙口坳，劈坳入长江。

1970年5月23日，湖北省下达了《关于倒水治理工程的批复》，正式批准工程实施。

为加强对倒水治理工程的领导，黄冈地区成立了“倒水工程领导小组”。由中共黄冈地委书记董复汉任组长，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贺导海、军分区副司令员朱荣贵任副

组长。同时决定红安、麻城、黄冈、浠水四县各组织人力支援倒水工程，各县单独成立指挥部。

1970年6月中旬，长36.8公里的倒水河下游改道工程，在一片欢呼声中破土动工，一场声势浩大的会战打响了。十几万新洲及外县支援人员，挥锹挖土，劈山开河，呈现出一派“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观景象。

广大民兵冒酷暑、战严寒，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劈开了周昭、韩弄、王店、龙口四个大山坳，斩断了米筛湖、蔑扎湖、鄢

家湖、陶家大湖。挖山开河达8.95公里，穿湖筑堤长19.16公里。整个工程共完成土石方3475万方（其中石方953万多方），混凝土7.88万方。

1972年4月，倒水改道胜利完成，倒水撇入长江，水患终于根治，新洲人民世世代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李少武，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干部，
武汉市史志专家库专家

汉阳老城访“旧学”

◇ 施惠芳

汉阳曾有座老城，人称汉阳城，建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汉阳城曾是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商贸业发达。从宋代开始，汉阳城开始设立书院，接待四方学子，学风渐浓。今天在汉阳我们依然可以探寻到它们部分踪迹。

贡院牌坊

汉阳显正街曾是老城的中轴线，大街两旁署衙相邻，同时府学、县学、书院、贡院及旌表科举入仕的牌坊林立。

贡院在显正街西南侧，以它为中心，东边是文昌宫，西边是晴川书院，两侧是专售古籍善本、文房四宝的书坊。

贡院正面矗立着一座石牌坊，就是今天尚存的贡院坊，六柱三门。六柱顶端各有一石狮坐踞，柱下有回文抱鼓石，三门之间两楣连接。

贡院牌坊庄严挺立，科举开考考生云集，虔诚肃穆地穿过牌坊进入贡院。官员经过，也对它恭敬有加。

每当汉阳举人在会试、殿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汉阳地方官绅就会在贡院街上建造一座新牌坊，一来彰显荣耀，二来鞭策学子。据《汉阳府志》，清朝时贡院街曾经立有牌坊12座，其中较著名的有表彰父子二人考中进士的“父子进士坊”、表彰明万历年间榜眼的“萧良有进士坊”。

1905年清政府废止科举，贡院考棚拆除，其他牌坊先后毁弃，只剩下贡院牌坊孤零零立在路边。

1992年汉阳老城区改造，贡院牌坊处于拆迁建楼范围，在民间人士的呼吁下，经文物管理部门干预，从原址向西移动约20米，处在几幢高楼之中。

往日的“贡院街”因贡院不存，民国初年改名为“共元街”，后更名“共勉街”，现称“共勉小区”。

晴川书院

明清时期，汉阳有凤山书院、晴川书院、崇正书院等书院，晴川书院是最大的一个。



现存的贡院牌坊

晴川书院由汉阳府设立，创建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在汉阳城南纪门内，初名“汉阳书院”。乾隆七年（1742）扩建，并以唐诗人崔颢名句“晴川历历汉阳树”命名“晴川书院”。

晴川书院坐北面南，毗邻贡院。书院规模较大，环境优美，前有讲堂，后有生徒读书居住之所，西侧书轩可供游览休憩。常有书院教习、文人学者、名士乡绅在这里聚会，吟诗作词，舞文弄墨。

晴川书院招收汉阳府所辖汉阳县、汉川县、黄陂县、孝感县、沔阳州的学生，人才辈出。

清咸丰年间，汉阳城蒙受战乱，晴川书院被毁。战乱过后，汉阳府知府率僚属集资重建。清末新政，废止科举，推行近代教育，开办新式学堂。1904年，晴川书院改制为“汉阳府中学前堂”，保留了专门讲授孔子学说的“经学”及“史学”“算学”等课程，新开设了地理、外语、体操、图画、手工等课程。学

生不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重在学习实用知识。

1912年，官立中学改由省籍，汉阳府中学前堂更名“晴川中学”，此后又多次改名。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并入湖北省联合中学，西迁宣恩。1946年改名“湖北省立汉阳高级中学”，1953年定名“武汉市第三中学”。

人杰地灵，教育传承，武汉三中发展成为汉阳乃至

武汉的一所名校。1984年全国高考理科状元、1994年武汉市理科状元、2007年武汉市理科状元、2014年湖北省文科状元、2016年湖北省理科状元，均出自这里。2019年开设钱学森班，聚集追梦航天的学子，开启新时代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

2018年，武汉三中启动搬迁到四新地区，2020年完工，原校区于2019年成立“晴川高级中学”。



晴川书院旧址——武汉三中



1937年的汉阳训女中学图书室



1946年“训女”50周年校庆合影

训女学堂

1896年，在原凤山书院附近，英国教会循道公会设立“汉阳训女书院”，后改为“训女学堂”。开学之日因风气未开，女子入学者少，多为教会牧师及信徒的女儿，此外是少数有钱人家的女儿。1912年改书院为学校，易名“汉阳私立训女女子中学”，随着社会革命及女权运动的发展，学生人数逐渐增多。

训女中学课程设置比较特殊，既有《圣经》，也有《四书》，还有中文、英文、算术、地理、手工等。此外，也开设针织、缝纫、烹饪等家政课程。

1919年训女中学更名“私立汉阳训女女子高中”，附设初中、高小部，教学体系更趋完善。1927—1928年，校舍被军队占用，校方与美国圣公会协商，暂时在汉口旧德国租界四维小路继续办学，朱岫云成为“训女”的第一位华人校长。

1929年“训女”迁回汉阳，1938年日寇入侵又迁至汉口旧法租界协和礼拜堂。1942年日军进入汉口各国租界，“训女”也被封闭，被迫转移到四川奉节，后辗转至

万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次年迁回汉阳原址。

解放初，“训女”属湖北省教育厅管辖，受教育厅补助。1952年初，小学部并于他校。1953年改为公立，更名“湖北省汉阳女中”，1958年改为“武汉市二十三中学”，开始男女生兼收。1964年又改为“武汉市二十三女中”，1968年恢复“武汉市二十三中学”。

2006年8月，随着城区发展，学校整体搬迁至十里铺，开启汉阳优质教育“西扩”之路。原校址为钟家村寄宿小学使用。

目前，二十三中学是汉阳两个省示范高中之一，它与三中错位发展，注重开发学生潜能，成就最好自己。

施惠芳，武汉市汉阳区政协文史教卫委员会主任

多重角色的文艺女兵

◇ 毛志红（口述） 闻政 刘桂英（整理）

人物名片：毛志红，江夏区政协常委、区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区文联主席。

在北京，我跟随军人父亲在部队大院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父亲博学多闻，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经常站在他身边一边研墨，一边欣赏。我10岁那年，父亲转业回到家乡江夏（当时的武昌县），进入宣传部，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回到这个“君子之郡”，沐浴新风，思维也随江流舒展，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既新鲜又亲切。故乡，这个有魔力的词吸引住了我，此后“子承父业”，我的文艺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

“女汉子”团结政协文艺力量

1989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江夏区体委（原武昌县体委）、江夏区文体局工作。其间，我组织过各类大型文体赛事活动，为

体育赛事做过解说，多次上台表演，积累了丰富的办赛办会和演出经验，逐渐成为文艺工作的行家里手。

2013年，我被调到区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宣教工作。随后，当选为区政协常委、政协文卫体组组长。不论是本职工作还是政协履职，我都全力以赴，目标是挖掘江夏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江夏文化品牌。

同事们曾调侃说我是一个“女汉子”。确实，我办事不喜欢拖拖拉拉，说干就干，精准切入，迅速决断，身上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拼劲。

为摸清江夏文化“家底”，2017年，我组织一班文卫体的政协委员，全面调研江夏区文化资源。我们走街串巷，访问老人和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农庄，调查农业和文化旅游现状，听取农民、农庄老板和农企人士的想法，为江夏区创新文化发展寻找突破路径。

在谭鑫培公园地铁七号线施工现场，

大家踩着湿滑的黄泥，一边走一边讨论地铁开通后如何利用交通便利，打造谭鑫培京剧文化二期工程。在炎热骄人的夏日下，我们走在环山路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探讨如何利用 30 多公里环山路沿线果园、农庄、美丽村湾为乡村游展示民宿文化、地方美食文化。

这次长达数月的调查最终形成报告材料，我在政协会议上向区领导汇报了详细情况和政协委员们的建议，得到区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在后期为江夏文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参考意义。

政协和文艺工作在团结人、教育人、鼓舞人方面，有着同频共振的奇妙关联。政协平台让我的“女汉子”之声更响亮、“女汉子”之力更强大，在与身边各界政协委员的热烈交流、思想碰撞中，在多次的实地调研、采访对话中，江夏的身影穿过千年走进我的心中，我已能捕捉到它的那一丝神韵。文化是生命孕育的果实，也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灵魂。我立志弘江夏文化，见楚地精神！

“工程师”搭好江夏文艺舞台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题诗，道出了京剧老生谭鑫培在中国京剧界的泰斗之位。经我省戏曲专家胡汉宁考证，清咸丰年间，江夏流芳街九夫村谭左湾有个远近闻名的汉戏班，其中著名汉调艺人谭志道携家眷北上谋生，不仅带去了汉剧艺术，也把日后成为“京剧史上里程碑”式人物的谭鑫培带到北京。溯其根源，汉调和京剧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京剧谭门和江夏也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2007 年，江夏区曾组团进京拜访谭元



2019 年 12 月，参加政协活动途中

寿（谭鑫培之曾孙），并带去谭家族谱资料。在相互传递资料和交谈中，谭家人为成功寻根激动不已。谭元寿握着家乡人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并对江夏区政协副主席朱定呈说：“我们全家深深感谢你们，我们想尽快回乡探望，谭家人一定要尽力回报家乡。”

继 2009 年京剧谭门故乡行之后，在 2017 年谭鑫培诞辰 170 周年之际，我们计划在全年开展大型系列纪念活动。其中，仅 4 月份开展的活动就包括京剧艺术研讨会、谭鑫培大剧院奠基、京剧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收徒、多种形式的京剧展演、纪实文学《京剧谭门》第一卷首发等，可谓好戏纷呈、精彩连连。

大到活动整体策划，小到流程衔接、领导嘉宾接待安置等细节都要统筹安排落到实处，我将自己比作建筑工地的“工程师”，一砖一瓦都要严丝合缝，搭建好展示江夏文化的舞台。这一年，我多次往返于北



在纪念谭鑫培诞辰 170 周年新闻发布会上

京谭家和江夏之间，就活动事项与谭孝曾先生面对面沟通交流。

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临近开幕前的一个月，我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不断完善活动细节。春分后天亮得早，4月23日开幕式当天，我到达活动现场的时候大概是5点钟。最后一次检查现场准备情况，联系协调相关工作人员，使各项议程顺利衔接，只为确保万无一失。

终于在万众期待下，9点整，纪念谭鑫培诞辰 170 周年系列活动正式开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卢展工，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以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评论家叶少兰、迟小秋、孟广禄、李宏图、张慧芳等三十多位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内容丰富，带给全体工作人员的挑战也很大。我全场调度，忙得脚不沾地。之后，又马不停蹄地陪同嘉宾参加谭鑫培京剧艺术研讨会等所有活动。直到晚上 10 点多钟，我才有时间坐下来喝口水，这时嗓子哑了，眼圈也黑了，可我觉得很值得。

这次活动吸引了中央、省、市 20 余家媒体聚焦并进行了跟踪报道，为谭鑫培京剧文化品牌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也让“京剧谭门”成为武汉打造戏码头的一张靓丽名片。

江夏画派是江夏区另一张文化名片。从父亲虞一风开始，到儿子虞小风，再到孙子虞旻子，祖孙三代接力传承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夏指

画。为了让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发扬，我多方奔走，积极为虞小风指画鼓与呼。从 2016 年开始，在江夏区各级领导支持下，虞小风画展先后三次在武汉市美术馆、湖北省美术馆全方位展出，并出版了《指墨文心》《指墨百年》等精美画册，为江夏文艺的剧场添一笔亮彩。

“老战士”关切群众文艺生活

江夏区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百花奖”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赛等已连续举办多年，我也在这数十年的历练中逐渐成长为迎难而上、有条不紊的“老战士”。

“三下乡”活动在每年的春节前夕，天寒地冻，筹备不易。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我总是起早贪黑，提前准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筹集文化和科学书籍，邀请文艺工作者参与服务，请来手艺人展示技艺……这样一场涵盖文艺节目、民间手工艺、春联书法、各类书籍等的百姓春节大联

欢，才算齐备。每年活动现场，看到群众们一张张喜气洋洋的笑脸，再冷再累我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百花奖”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赛活动举办三十周年之际，我组织文学、音乐、曲艺、书画界的相关专业人才，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书写江夏群众文化发展历程，展示江夏群众文化发展硕果。后来，以江夏区“百花奖”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赛为主题编辑出版了《武汉宣传》专刊，被称为江夏文艺的“小历史书”。

值得一提的是，我从“楚楚江夏郡，谦谦君子风”得到灵感，以弘扬江夏楷模人物精神为蓝本，打造了将介绍古代君子文化与弘扬先模精神相结合的访谈类电视节目——“君子讲堂”。这可称作江夏文化工作的一次首创了，我也期望将其打造为江夏又一文化精品。为了办好这个节目，我带领同事，一次次走访专家和文化界老同志，征集意见和建议，邀请江夏文化学者，确定活动宗旨、内容与形式等。目前，已有6期节目问世，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推动了江夏的文明建设和君子文化的普及。

2020年庚子战疫之初和2021年8月疫情防控期间，我第一时间部署区文联开展以“战疫·绽艺”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江夏区文艺界人士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画和摄影等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普及抗疫知识，让老百姓了解防疫知识政策，弘扬社会正能量，其中《在一起》《合力追剿“德尔塔”》等节目登上“学习强国”平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因受疫情影响，筹划了几个月的“百年献礼·江夏风采”歌咏大会几经波澜，最终确定于6月23日以“线下举行+线上直播”方式开展。活动前两天，我到彩排现场检查

准备情况，发现一连串问题，提出整治意见。由于休息不足加上受凉，我发低烧了。晚上有第二轮彩排，我不能不去亲眼看看整改后的效果。正值疫情特殊时期，我不敢怠慢，马上去医院做核酸检测，确定无碍后，当天晚上同工作人员一起彩排到十点多钟。第二天上午，活动顺利举行，我到现场指挥，区直12家单位秩序井然，千余人组成的演出方阵气势恢宏，掌握江夏App直播观看人数达13.8万人次。

三十二年的躬身耕耘，我从一个文艺青年成长为江夏区宣传战线一名老兵、二级调研员，也见证了江夏文化发展繁荣、砥砺前行坚实脚步。2021年底的区两会上，江夏将文化名区作为五区战略之一，这既是江夏文化发展的东风，也是我们文化人肩上的重担和责任。站在新起点，迎着新方向，展望新未来。我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进一步繁荣江夏文化、建设文化名区谱写新的华章。

闻政，江夏区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刘桂英，江夏区文联副主席

愿做青山的一根绿竹

◇ 刘进波（口述） 郑雅飞（整理）

人物名片：刘进波，青山区政协委员、湖北鑫正扬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民建青山区工委副主委、青山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武汉市第五届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

一个天高云清的日子，江水悠悠，诗人乘着船，溯江而上。转过一个弯，“武昌在前头”，他却逡巡不前，只因“为爱青山矾，且对青山住”。这是五百年前的青山，她秀丽的身姿引人流连、入诗入画。五百年后的青山，从钢与火的锤炼中走出，曾用坚实的骨架支撑起现代化的高楼林立，终究气喘吁吁、满面尘土地停下脚步，重新收拾行装。

当她一路向前，披挂着共和国重工业的勋章，意气风发之时，无数人向她涌来；但当她尘土满面、荣光不再之时，又有几人会为她驻足。而我，一个沐浴在她钢铁事业夕阳余晖下的企业家，一个成熟于她挣扎转身蜕变新生时的政协委员，“咬定青山不放松”，只愿做青山的一根绿竹，让她更青、更美。

初入青山

一担、两担、三担……扁担下挂着两个沉甸甸的竹筐，我一趟趟地运送着泥沙，走向亘古流淌的汉江岸边。家里已经负担着哥哥这个大学生的费用，实在供不起我读书，父亲的朋友介绍了“挑堤”这份工，未来如何？我眼前的路并不宽阔，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每当江面的风挟着湿润水汽钻入鼻孔，我十七八岁的心仍忍不住雀跃起来，脑际是大江拍岸的澎湃。这江水，要去往哪里呢？

“瞧见这堤里面埋着的钢筋没有？那才是硬家伙！”一个老工友敲了敲地面，“从青山武钢那边运过来的。”青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原来汉江堤岸用的就是那里出产的钢铁。汉江也终将流入那里，汇进长江。多美的名字，多好的事业！别人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不可以？我决定从仙桃去

往青山，从钢铁运输贸易做起。

1999年，我考到驾照，筹措了一笔款子。随后，开办了正扬运输，主要承接钢材市场钢材运输业务。这时正逢城镇化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一片红火，钢材的销路很广。承办钢材运输业务的商家比比皆是，但我无论与哪家企业打交道，都有规矩、有信誉、有保障，当然还有一股阳光向上的朝气。

新客户变成老客户，老客户再介绍新客户，口碑相传。渐渐地，我在青山站稳了脚跟，对需要钢材的客户做一些深度挖掘，从运输转到经营各类优质钢材。2006年，我成立武汉正扬卓顺工贸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这也得感谢青山这片包容的土地，给了像我一样数十万外地人同样的发展机遇。这时的青山，工厂烟囱林立，机器日夜轰鸣。公路上货车也是风驰电掣，追赶着国内突飞猛进的发展脚步。

重识青山

从2016年开始，武钢先后关停、拆除炼铁厂2号高炉、二炼钢厂3号转炉和7号、8号焦炉。2019年1号高炉停产。一个时代逝去了，新的时代已经降临。我开始重新认识青山，以政协委员的身份。

青山每天都在发生改变，重工业时代留下的灰尘和雾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渐渐被吹散、洗净。

冶金大道边的工人村都市工业园区是制造业集聚的一个老工业园区。每每进入这个园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尘土漫天，院墙边的零星绿意也被大面积的灰色扼杀，了无生机。于是，我提出《关于青山区都市工业园园区环境整治的建议》提案，区开发区承办，区城管委、园林局协办，按照谁受益

谁出资的原则，整修道路、加强绿化，将园区环境整治一新，老工业园区呈现出新面孔。

青山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这个职位给予我倾听民营企业心声的机会。青山区是典型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存在一些障碍。我从2018年起持续建言，提出可行方案，致力于帮助民营企业翻越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在此过程中，我本身经营传统建筑业的思维开始转变，有了更高的站位和更深远的考量。

前两年，我参与撰写了《关于加强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关于加快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推进武钢大数据产业园建设的建议》《关于打造科技产业创新孵化链条促进青山“四新”企业高速发展的建议》等提案，建议市、区二级政府组织推动引智培才工程，加强科技创新平



参加青山区政协十届五次会议

台建设,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优化产业结构,加速推进青山区转型发展。

在调查中学以致用,在建言后督办跟进,成为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既要像竹子一样虚心好学,也要像竹子一样不断拔节向上、正直无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愿做一根绿竹,为青山绘一抹新绿。

绿满青山

一根孤立的竹,山风袭来,很容易就折断了。但若是一片竹,无论风从哪里来,枝叶相连,逶迤绿波荡漾生姿,相携相助。我既愿做一根竹,也呼朋引伴,盼望聚成林涛竹海。

从2014年起,我回到自己的母校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中学,每年定向资助2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和10名优秀生,同时捐助大量书籍和学习用品。我是吃过读不起书的苦的,后来事业步入正轨后虽也研学进修过,但依然错过了最美好的大学时光。资助这些学生,一做就是7年,他们是真正的雨后新笋,有着光明的未来。

也是在2014年,我在青山区民政局成立了全区首个个人慈善基金——“刘进波慈善基金”,捐款额达50余万元,用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山区青和居时提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青山区工人村街青和居社区所在地原为棚户区,2015年12月完成改造。2017年,我于此创办“微创谷”孵化器,为工人村工人下岗再创业,以及吸引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条件,激发社区活力,为青山注入新鲜血液。创业企

业需要宣传,我在孵化器周边布置广告;企业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我找区房管局协商;科研团队申请专利、奖金,我主动帮忙准备材料……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有着协商民主、凝聚共识的重要作用。我履职其中,无论何时都谨记使命,团结一切有生力量,为地区、国家的发展助力。

我的企业在2017年转型,成立的鑫正扬建设有限公司从事各类建筑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市政工程、广告宣传制作及会议会展服务等。回应青山区转型发展的需求,我们参与完成了汉阳钢厂琴台市场搬迁改造工程、中交二航军运会保障路线靓化工程、青山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等市区重点项目。

今年,我与合伙人一同注册成立了数智武汉云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计划与京东等国内科研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一手抓实,一手抓虚,让数字经济的前沿技术落地青山。在服务市民、环境友好、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跑出民营经济的风采。

如今的青山,正在实施“一轴三区三城”发展战略,朝着转型、低碳、绿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扬帆起航。近年来,经过“城市双修”“四水共治”“海绵城市”“长江百里画廊青山段”建设,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打造花园工厂、修建生态公园,青山区已然蝶变。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展示委员风采,履职担当情怀。伫立青山江滩,感慨万千,牢记习总书记来武汉青山视察的谆谆教导,愿为建设现代化青山绿水红钢城奉献政协委员的一份力量,愿做美丽青山上一根葱翠的绿竹。

居人思客客思家

◇ 张杰（口述） 严濂（整理）

人物名片：张杰，武汉南通商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江苏商会副会长、武汉欧品至尊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家具销售商联合会（家商联）副会长。

武汉和南通的历史源远流长，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奇妙的缘分将我与二者联系在一起。南通有张謇，武汉有张之洞，他们都致力于振兴实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作出过巨大贡献。

我的爷爷凭着酿酒的好手艺，曾在张謇兴办的颐生酒厂工作过。自儿时起，我就听爷爷讲过许多关于张謇的故事。同是生于南通，又同是张家人，张謇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我立志以他为榜样，以振兴实业为己任。

居人思客客思家，生在南通，身在武汉，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能为武汉的家

居市场作出些许贡献，给我在南通的乡亲们争些脸面。

只身闯武汉

南通有着中国建筑之乡的美誉，我的父亲从事的就是建筑行业，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毕业后父亲把我推荐到他朋友的公司学习手艺。学着学着我就留在了这家公司。我一度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建筑行业。何曾想，1998年建筑行业遇到了瓶颈，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接到活，而我也因此被迫离开了公司。

在那之后的两年多，我自己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接了一些活，每天带着一百多号人起早贪黑，赚的都是辛苦钱。

2000年9月，在南京卖家具的舅舅让我过去帮忙。相较于艰辛的建筑行业，我



武汉南通商会常务副会长张杰

觉得家具市场更具发展前景，是个不错的选择。24岁的我只身来到南京，在舅舅的帮助下学习着家具行业的门道。从了解产品，到卖家具，到帮忙打理门店，再到成为店长，我竭尽全力的走好在这个行业里的每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给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年轻气盛，心里总是暗藏着一股“向前冲”的闯劲。渐渐地，我开始不满足于舅舅那种传统保守的经销模式，希望能够以令人信赖的品牌为主打造深入人心的家居概念。舅舅不以为然，我却觉得非做不可。

2002年8月，我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位于武汉的欧亚达家居正在招商。我向舅舅请假说回老家看看，却一个人坐车跑到武汉考察。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坐了几乎一夜的车，从车站出来已经将近凌晨四点。

疲惫不堪的我本想着自己先找个酒店歇歇脚，没想到的是欧亚达派来的工作人员居然一直在车站等我，令我感动万分。他带着我来到事先安排好的酒店，并告知我用早餐的时间，让我先小憩一会。几小时后，我们趁着一起吃早餐的时间，就第一批商户入

驻的地点和租金进行了沟通。早餐后，他就带着我一起去现场实地考察。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天的时间，可所有的细节至今都令我记忆犹新。

回程的路上，欧亚达家居工作人员带我参观考察的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反复呈现，他们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心里未来的道路也逐渐清晰起来。

回到南京后，我向舅舅坦陈了我的想法。可舅舅却劝我不要选择武汉，他说如果在南京发展，不但离家近，还有他的帮衬。如果去上海，相对机会多，发展前景更好。可我却不愿放弃这次机会，坚定的选择了武汉，下定决心创立属于自己的家居品牌。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欧亚达家居如今已成为中国知名家居连锁商场。伴随着欧亚达强大的发展势头，我在其间开设的家具店铺不断扩张，从徐东开到了光谷，从黄石开到了杭州，最多的时候总共达到了三十几家。

现在回过头看，连我的舅舅都说，他钦佩我当时只身闯武汉的勇气，选择武汉是个正确的决定。

服务真与诚

毋庸置疑，行业内的品牌竞争相当激烈，想要在家居行业做大做强，我们应该站在产品制造商、消费者等多个角度去思考运营管理策略，把服务做精做细，让消费者感受到我们的物美价廉的“真”和服务至上的“诚”。

刚开始我们为了打开市场，几乎不会

错过进店的每一位顾客，极力向他们展示我们售卖的家具优势和特点。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家具清单，争取能给消费者更好的购物体验。

事实证明，武汉的家居市场果然很有潜力。我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回了前期的三十万投入。这让我信心倍增，更加相信了武汉这座城市强有力的发展前景。

2014年12月，武汉欧品至尊家居有限公司在武汉正式成立。我们的家具店铺也同时在欧亚达、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家居进行扩张。

“欧品”最初建立的时候的主打“欧式家具”，在武汉欧式家具品牌里位列前三。近几年在美式、新古典、韩式等不同风格的家具轮番占据主流的情况下，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主打产品的风格。

为了适应潮流的变化，我常年往返于北京和苏杭一带，争取为消费者挑选到更精美同时性价比更高的家具。实地考察的经验告诉我，北方的实木类家具更占优势。相较而言，南方则擅长于雕花工艺，以精细的做工取胜。根据消费者个性化的偏好，我们会联系不同地域的生产厂家，尽量给消费者提供最优的选择。

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经营方式也应随之作出改变。从传统的店内经营，到下沉周边的小区获客，抑或是与楼盘合作样板间的打造，甚至是谋求与建材商的合作，我们从未停下求新求变的脚步。

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最近我已经开始研究线上平台和抖音等新媒体销售模式。通过自主运营，定时推送视频等方式实现线上的精准引流，以达到线下门店扩大客流的目的。

我始终认为，家居这个行业是不会完

全被线上销售平台所取代的。因为家居这个行业注重的是体验感，线上引流到店以后，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

与传统的经销模式相比，个性化定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也无形中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九零后和零零后的消费时代即将到来，我们的家居理念也逐渐趋于年轻化，将定位着眼于高性价比的设计产品，并以一站打包的形式提供给客户更好的售后体验。

我们能提供给客户的不仅是当下最流行的智能家居体验，还会有专门的室内设计师和软装设计师给他们提供相对完善的设计方案，以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线上引流和线下体验的完美结合。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线上的客服接单以后，会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连串的后方辅助，从设计到体验，最后到上门安装，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做到更好。

就在前几天，一位客户在我们这里定制了一套家具，送货时才发现客户住在高层，而沙发因型号偏大，无法从大门搬运。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无奈只能用吊车的吊臂将沙发从窗户运到客户家里，我们为此还贴了一笔两千元左右的运费。这笔意外的运输费我并未向客户提及，顾客后来知道了感动不已，还说要请我吃饭。好的口碑，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形的服务打造而成的。

善与爱同行

我觉得，善源于爱，也源于男子汉的责任心。

中国家具销售商联合会，简称“家商联”（CFDA），由全国各省市优质的家具



组织赴鄂州的爱心公益活动

经销商组成，是全国唯一的高端家具经销商协会；武汉市南通商会，是张謇故乡的民营企业家在武汉弘扬张謇企业家精神，促进武汉、南通交流发展的社团组织。作为“家商联”的副会长，南通商会常务副会长，我一直倡导民营企业家在行业内的互帮互助，社团中的共同发展。通过异界联盟的方式，加强交流，致力创新，抱团发展，回报社会。

武汉有一个家具经销商运动俱乐部，其中一百多号人都来自于武汉的家具市场。身为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我经常组织大家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帮忙行业内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葡萄园园主发出的求助声明，说是自家的葡萄园遇到了经营危机，大批的葡萄可能会因此浪费在葡萄园里。我们家具运动俱乐部当即组织了一个几十人的车队，开车去他们家葡萄园收了他们家所有的葡萄。回来以后自己吃不完，就送给亲朋好友。于我们而言是举手之劳，却解了葡萄园主的燃眉之急。

曾经有一位在家居行业共事多年的老友，因为经营不善，店铺亏本，离开了家居行业。多年后，听说老友家人生病，我们俱乐部一起拿出了十万左右的捐款帮助他们家渡过难关。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只要我们行业内的兄弟姐妹们携起手来，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都遇到了实际的经营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家居行业的企业们从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发挥力量，捐资捐物，为

武汉当地医疗机构提供家居建材和建设支援。情况相对稳定以后，家居卖场和家具工厂又给予了商铺们大力的支持，互相让利，共度时艰。

行业内是如此，公司内部更是如此。我第一个店里的员工至今为止一直跟着我，他说我对待员工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只要是在企业里工作满十年以上的员工，都有机会享受公司组织的培训学习和旅游活动。我觉得，员工的业务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而员工的人品和对企业的忠诚度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

“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从2002年来到武汉，到今年就满二十年了，我一直将这句话作为我的人生信条。

居人思客，愿家乡的亲人们，每每念及我时都能引以为傲。

客亦思家，愿企业的每一个员工，都能在我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家居之人，天大地大。心有所属，勇闯天涯。

趟出一条多元化发展之路

◇ 顾枫（口述）闻夕（整理）

人物名片：武汉咸宁商会会长，湖北嘉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净宝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第十一、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委员。

在嘈杂的生产车间里，我和工友将木材抬上生产线，经过层层工序，木材变成床具，打包发往各地。这是我刚步入社会的1986年，繁重的体力活让我无暇畅想未来，只想着干好眼前的事。我坚信，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走出嘉鱼 商贸起家

1969年5月，我出生在净堡嘴顾家湾这个贫穷的村湾。在三姐弟中，我排行老二。由于家里条件艰苦，我每天要走5里多路去上学。高中毕业那年，我来到离家十多里路

以外的潘家湾联乐床俱厂打工，从车间工人干到了销售主管。在床具厂里，我不仅超额完成了企业下达的销售任务，同时也增长了社会知识，开阔了眼界。24岁时，我决定逐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去荆门开办了家具厂和木线条加工厂。

为了找销路，1997年我孤身一人来到武汉，找亲戚朋友七拼八凑了3万元，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门面，而这个门面就是几年后武汉建材市场上的后起之秀——武汉世纪红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雏形。虽然刚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点，但在我眼里，那是我实现人生理想与抱负的初航，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小心翼翼地打理着它……

回想起创业之初的辛酸，实在太多太多了。有一次，我从广州订购了一批价值十几万元的木材回汉，可货车司机将货全部偷走了。我当时十分焦急，做人不能失了信誉。



武汉咸宁商会会长顾枫

货车司机欺骗了我，但我不能让我的合作者失望，于是我第一时间将全部货款打给供应商，然后再去处理被盗事宜。后来公安机关破获了该案，追回了部分损失。事情传开后，各大木材供应商都愿意将自己最优、最新的货物供给我，而“红枫商贸”也因此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利用城市快速发展、专业市场迅速崛起的机遇，大量新增门点，并采用连锁经营的模式，统一配货渠道、统一服务模式、统一产品形象及价格等，在木业批发领域首先树立起规范化的品牌经营服务理念，深得顾客信任。

短短几年时间里，“红枫商贸”声名鹊起。我实现了从一个小小的个体户到一名企业老板、从简单的门面经营到业内一领风骚、从年销售额不过几十万到过亿的蜕变，“自强不息，奋斗向上”的信条我深信不疑。

我并没有止于现状。2003年，随着武汉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市场的变化，我果断创办了武汉金思路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之所以成立这个公司，一来，我在“红枫商贸”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很多装饰设计工程的

经验与信息，也结识了许多业内资深人士，为企业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经营基础；二来，我在市场走向上发现了产业链的深化发展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最有效途径，通过产品自然形成的上、下游关系，其间所连带的、可以深化的产业价值是最熟悉最简单的裂变过程，只需稍加扶持和投入，一个新的企业就会孵化而出，而已经做大做强了的“红枫商贸”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孵化出的武汉金思路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由于有“红枫商贸”坚实的基础铺垫，“金思路”公司成立不到一年时间，就先后承接了一大批公装项目。“金思路”扬帆起航，为我日后的事业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与人脉资源，当然最大的收获是丰富了我的管理经验。

进军地产 企业裂变

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主力城市，现代化发展与城市改造的节奏日渐加快。各大城市的佼佼者纷纷入驻，我看到了激烈的竞争后面潜在的大市场——房地产业。我认为地产业将是近20年甚至更多年内的城市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于是，2006年我成立了湖北嘉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嘉晟置业”公司成立后，我认真的对武汉及其周边的城市市场进行了考察，确定了“以武汉为中心，从周边中小城市着手”的企业开发战略。初始拿到了嘉鱼“水岸新城”项目的开发权，虽然只是开发面积6万平方米的项目，但却是我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处女作。

首战告捷大大增加了我对自已战略部署的信心，也挑起了我更强的斗志。2007年底，我再度出击，与湖北兴耀电力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嘉鱼“东领·尚城”项目。这个开发规模达15万平方米的项目又一次震动了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市场。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降临，很多开发商都尝尽了苦头，许多地方更是涌起一阵“退房潮”。我认为物极必反，危险来临时一定伴随着机遇，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做出了大家都不理解的行为——远赴宜都拍下了一块218亩的土地。

这个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时尚小区，在宜都掀起了购房的热潮，开盘当天，可谓万人空巷，因为它先进的居住理念、人性化的设计、别具匠心的户型、大都市化的齐全配套设施……它的一切，都成了宜都商品房的航标灯。我再一次用自己的实践说服了大众！

我的企业不大，但是我们要用大企业、大品牌理念来要求自己；我们现在不是最好的，但只要我们尽力做到比别人更好，我们就成为最好的了！就是靠着这种意念我一步步走过来。对自己、对社会的发展我信心满满！

2009年我有幸被武汉市工商联评为“建国60周年武汉杰出创业领军人物”。2012年，黄梅嘉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以2.77亿元拍得256.73亩土地开发权。同年，湖北嘉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晋级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

2013年，我入股咸宁和嘉鱼农村商业银行，成为其大股东；收购湖北嘉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入2.22亿元参与湖南津门市“万户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8年，我积极响应国家“支持西部

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昂首挺进贵州安顺，注册成立贵州嘉誉天晟置业有限公司，并成功竞得安顺市800亩城央临湖土地，致力于打造安顺最高档的洋房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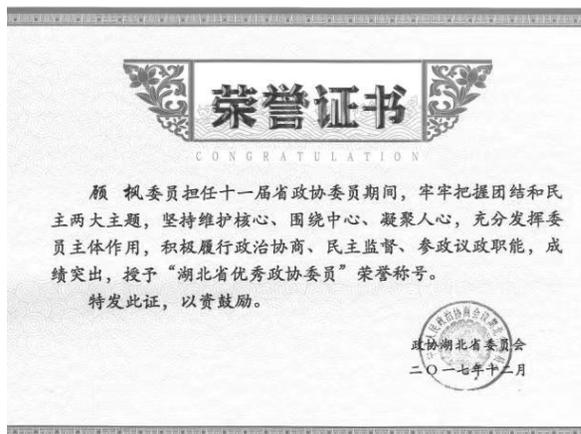
心存感恩 投身农业

通过几年的发展，我的企业不断壮大，并已初具规模。但致富不能忘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的问题渐渐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我是土生土长的嘉鱼人，为了使家乡村民彻底脱贫致富，2010年，我回乡创办了“湖北净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国家号召全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感召下，我以个人名义出资800万元，为净堡四组建成了24栋徽派风格的民居和1栋村民活动中心，免费赠送给村民居住，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我的这一举动，还带动了当地一批成功创业人士关注家乡、支持家乡建设。

2011年，我主动与渡普镇政府协商，由湖北净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承担烟墩社区新农村建设任务。该社区投资达2800万元，其中我公司出资1200万元，其余部分政府补贴一点，入住村民自筹一点。该项目占地面积66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可供117户村民居住，配套建有绿化带、休闲广场、幼儿园、医务室、商店等公共设施，是一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新型农家社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家乡村民建成新农村社区、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我还打造赤城湖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和鄂南桂花苗木示范基地。



湖北省优秀政协委员荣誉证书

湖北净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整体承包了渡普镇赤城湖 1800 亩水面，投入资金 500 多万元，对赤城湖围堤、泵站以及水产养殖设施进行改造和修复。同时，在赤城湖水面进行鱼鸭主体养殖示范，全力打造湖北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养殖基地送检的无公害产地和无公害农产品样品检测全部合格，由农业农村部、湖北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分别颁发了《无公害产地证书》和《无公害产品证书》。

按照《渡普镇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公司聘请湖北省林业勘察设计院专家编制了净堡新村建设发展方案，规划建设鄂南万亩桂花苗木基地。公司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在渡普镇净堡、烟墩两村承包荒地 3000 余亩，栽植桂花、樱花等苗木 30 多万株。示范基地的建设，不仅解决了地方道路、排灌、泵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而且还为村民增加了土地收益和经济收入。

2013 年 7 月，湖北净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荣膺“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得到了湖北省“三万”活动领导小组的表彰。

我经常在项目各地来回奔波，虽然很忙，但回馈社会的脚步一刻都没停。

1998 年，洪水来袭，簰洲湾受灾严重，我第一时间捐资修桥、修路、重建小学。2013 年，向“希望工程”——咸宁爱心厨房捐款 10 万元；认捐 4 名嘉鱼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多年来，我先后为光彩事业、抗震救灾、扶贫助学等公益事业捐款达 200 余万元。

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认真履行政协委员职责，踊跃提交各类提案建议达 40 篇，其中 2015 年提交的《关于将簰洲湾堤纳入长江干堤管理的提案》和《关于将嘉鱼县永逸、后垵泵站更新改造项目纳入相关专项规划并争取国家资金支持的建议》引起了省水利厅的高度重视，湖北经济电视台与省政协合办的《提案追踪》栏目在 2016 年 7 月 25 日分上下集播出了这两个提案的办理情况，省水利厅已将嘉鱼县永逸、后垵泵站更新改造项目上报水利部审核。还有 2016 年提交的《关于嘉鱼县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议》也得到了省农业厅的重视。省农业厅报经省政府同意，已将嘉鱼县认定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并下达中央和省级项目资金 4567 万元。

2014 年我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湖北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2017 年 1 月被湖北省政协授予“优秀政协委员”称号。人生没有剧本，关键是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从单一的商贸公司到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农业科技、金融投资等产业全面发展，我用行动趟出了一条多元化发展之路。

探寻蛇山历史深处

◇ 董玉梅

武昌的蛇山，最高海拔 85 米，如伏蛇绵延，把城区分成山前、山后。蛇山上的故事很多，民间传说也很有生命力。唐代的蛇山，曾称为黄鹤山，因鹄、鹤相通，也称黄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望黄鹤楼》诗赞蛇山：“东望黄鹤山，雌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

走进书籍的浩瀚海洋，发现记载黄鹤山的史书，无不把黄鹤山与黄鹤楼紧密相连。到底是黄鹤山美化了黄鹤楼，还是黄鹤楼提升了黄鹤山？翻开《江夏县志》，映入眼帘的黄鹤山与黄鹤楼，大气得美仑美奂：

“按山自咸宁南来入邑，北行复折而西。迺迤至城东，绵亘如长蛇，奋跃入江，其首隆然，黄鹤楼焉。”胡凤丹在《黄鹤山志·卷一》中说：“高冠山，一名高观山，一名蛇山，即黄鹤山支阜。”然支阜的东边有“凤凰窝”，西边有“乌龙池”，还有“清风明月二井”。在古人眼里，蛇山充满诗意，好想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充满仙气、又诗情画意的高冠山去，入凤窝，蹀龙池，沐清风，赏明月，即便仙人“骑鹤”归去，也丝毫不会影响蛇山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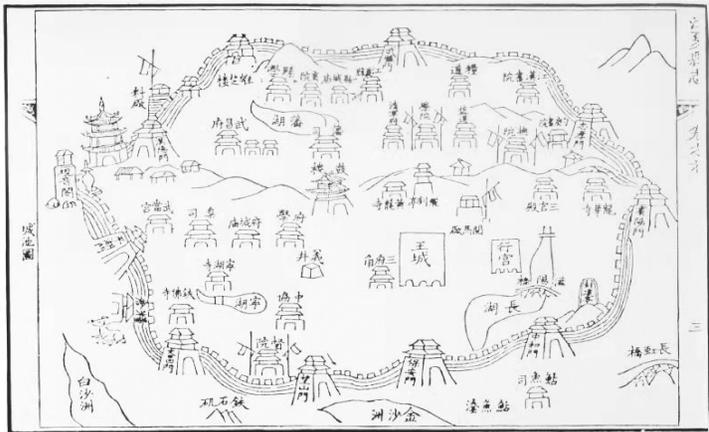
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早就不提高冠山，也较少提黄鹤山了，而是按山的形状直称蛇山。说蛇山，首先就要说黄鹤楼，黄鹤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蛇山，不仅取代了蛇山，还成了武汉的代名词。但说到底，黄鹤楼只是蛇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山，哪有楼？

孙权首筑夏口城

溯源黄鹤楼的来历，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即夏口城设立的军事瞭望哨，就是今天黄鹤楼的前身。

历史上的武汉，确实是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活动的重要之地，但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前，无论是吴国还是蜀国，其活动的主要地盘都在汉阳。

夏口城的建立，应该从关羽遭吴军偷袭、败走麦城说起。关羽被杀，刘备大悲，不顾诸葛亮劝阻，决意为关羽报仇，亲率大军讨伐东吴，结果在彝陵几乎全军覆没。杀关羽、败刘备，孙权自知和蜀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为了防止蜀国进攻，也为了屏障



1794年《江夏县志》中的武昌城图

首都武昌(今鄂州),遂把目光移到江夏山(今蛇山)。所以,夏口城的修筑,是孙权和刘备之间争斗的结果。

刀光剑影、白骨露野之后,江夏山向我们走来。蛇山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就是与夏口城这座军事城堡一起走来的。1700多年前的军事城堡,用今天的眼光看,不过一个小土城。小土城面积不大,只有二三里,但它背依蛇山,面对沙湖,西临大江,具有“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壙藉阻,高观枕流,上则游目流川,下则激浪崎岖”的气势(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江水·三》)。加之,小土城肩负着保卫都城武昌的重任,很受孙权重视。《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对此有明确记载:黄武“二年(223年)春正月,……城江夏山”。这句话的含意在清代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輿纪要·湖广方輿纪要序》中阐述的很清楚:“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曰重在武昌也。”确实,夏口城的修筑在吴国历史上不是小事,所以,孙权把夏口城之名给了小土城,使之迅速成为东吴的军事重镇。

回眸历史的轨迹,史家终于确认了这个小土城,就是“武汉双城”的起源地之一。

孙权还都建业(今南京)后,夏口城仍然是拱卫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地。随着战争的减少,夏口城人烟渐次密集,周边开始发展。此时,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都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孙权在黄武五年(226年)颁下新诏:“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是啊,

国力要恢复,必须要安定民生。国泰民安,人口才会增加,城市才会扩张。

夏口城修筑17年后,孙权再次颁下新诏:“诏诸郡县治城郭,起雉楼,穿塹发渠,以备盗贼。”此时,是在鼓励城市建设了。关键是,在孙权的新诏中,我们第一次看到“楼”的信息。夏口作为拱卫都城的军事城堡,应该在这个诏令之后才开始修筑雉楼(雉楼即城门上的瞭望楼),它不仅仅是战略需要,也是实力的展现了。但这个雉楼是黄鹤楼的前身吗?不能轻易下结论,但由此可以推测,最初的瞭望楼并非搭建在黄鹤矶上的独楼,可能就是临江城门上的雉楼。



孙权绘像

此时，经过几任夏口都督的精心治理，夏口城沿江一带已开辟了诸多港口，港内既能屯兵又能藏船。此时的夏口都督孙壹，认真贯彻孙权休养生息的思想，率领“部曲千余口，平时屯田，春种秋收，对夏口地区的水稻种植有所推进”。屯田养兵，也是忠实贯彻黄武五年孙权的治国思想的。夏口城，已不仅仅是长江中游城港一体的战略重地，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上述内容中，还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即湖北一带大规模种植水稻，是从东吴军队驻守夏口城开始的。

黄鹤楼是三国瞭望楼存疑

孙权返都建业后，为及时掌握边境军情，曾命令在长江沿岸的制高点设置烽火台，“沿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火）以其告，一夕可行万里。”毫无疑问，江夏山上也有烽火台。但烽火台会建在矾石上吗？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建在江夏山顶的可能性应该更大。所以，笔者以为，黄鹤楼最初是建在黄鹤矾上的瞭望楼颇有疑问。如果一定要坚持黄鹤矾上有瞭望楼这种说法，那黄鹤楼的前身就可能不是东吴建的了。

为什么学者们都认为黄鹤楼最早是建立在黄鹤矾上的瞭望楼呢？这与唐代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志》有直接关系，该书如是描述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戍地也。”这没有一点问题，在江夏建城，就是军事需要。但他接着又说：“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矾名楼，为黄鹤楼。”就是这句话，把建楼的时间固定为黄武二年，把黄鹤楼固定成军事瞭望楼，并把军事瞭望楼固定在了黄鹤矾上。凡军事瞭望楼，都是为了登高警戒，夏口城背依江夏山，“开势

明远”，借助山体进行警戒已是绰绰有余；即使不登山，站在矾上也已经“游目流川”了，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石矾上建楼呢？我理解李吉甫的这句话，其意应为“在原夏口城的西南角，有一个黄鹤楼，楼因黄鹄矾而得名”。这句话已脱离了他想考证的内容，不过是描述自己所看到的景观罢了。

其实，无论黄鹤楼何时出现，也无论黄鹤楼最初是在黄鹄矾上单独存在，还是作为夏口城临江的谯楼，它的出现，都足以证明，武昌乃兵家必争之地。

到了西晋，对行政建制进行调整时，因为夏口的富庶和地位的重要，就把沙羨县治移到了夏口城。一个军事城堡开始向区域性政治中心转变。

萧思话扩筑郢州城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夏口屡为交战双方争夺的战场。战争的频繁，也注定了夏口城地位的不断提高。

南朝刘宋的第五位皇帝刘骏，于元嘉三十年（453年）即位，是为宋孝武帝。这是一位机智聪颖、文武双全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推行一系列改制措施，削弱士族势力，



宋孝武帝刘骏绘像

整顿刑律，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改置州镇。

为削弱方镇势力，宋孝武帝登基第二年，即孝建元年（454年），就把荆、湘、江、豫4州中的8郡划出，设立郢州，这就是历史上的“分荆置郢”，郢州的治所设在了夏口。夏口遂从县治所在地升为州治所在地。

郢州的管辖范围有多大呢？据《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所载，新置的郢州“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天门后还荆。领郡六，县三十九，户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由此记载可知，郢州的面积真不小，人口也真不少。

刘宋“分荆置郢”，除上述原因外，与夏口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直接相关。第一，夏口处于荆、湘、扬三州之间，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无论去往何地，都有水路之便，故而能有效地牵制三州；第二，设郢州治所在夏口，对荆州的制衡非常有力，从夏口城溯汉江而上，可至襄阳，进而至汉中。“竟陵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第三，夏口作为战略重镇，被东吴经营多年，“浦大容舫”，是训练水军的优良基地。所以，“分荆置郢”，让郢州稳居中游，成为扼住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关口。

如此重镇，让谁来掌控呢？即第一任郢州刺史的重任交给谁呢？宋孝武帝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交给国戚萧思话（400—455年）。同时，还让萧思话兼督湘州。

萧思话是前将军萧源之的儿子，孝懿皇后萧文寿的侄子。确实是国戚，但也是刘宋时期的名臣，治国的栋梁之才。他18岁



萧思话绘像

时就步入仕途，任过青州、兖州、徐州、冀州等州的刺史，治理地方经验很足。意图削弱士族势力的宋孝武帝任命他为郢州刺史，确实是动了一番心思的。萧思话不负重望，到达夏口城后，为了增强军事防御力量，立刻对夏口城进行维修和扩建，让夏口城变身为郢州城（亦称郢城）。

萧思话扩建的郢州城，沿蛇山西端北坡而上，直至山脊。刘宋文帝时成书的《荆州图经》形容黄鹤山中建有“高牖”。这“高牖”，就是指的郢州城高大厚实的城墙。《南齐书·卷十五·州郡下》对郢州城的记载更详细：此城“据黄鹤矶，边江峻险，楼橹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宋孝武置州于此，以分荆楚之势。”所谓“边江峻险，楼橹高危”，其意是新城的城墙延到了江边，城墙上还建有用以侦察、防御、打击攻城之人的“楼橹”（系古代作战时搭建的没有顶盖的高台）。

注意，这个“楼橹”据黄鹤矶，高到可以“瞰临沔汉”，可见作为瞭望及防御的作用不可小觑。笔者推测，黄鹤楼的前身，应该是这个“瞰临沔汉”的“楼橹”。然《荆州图经》《南齐书》都没有涉及郢州城的质量，《寰宇通志》便进行了补充：“盖其城

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筑城欲坚不欲广也。”

孝建二年（455年），萧思话在郢州任上的第二年，便去世了。这一年，他只有56岁。萧思话去世的原因，史书没有说，但来到郢州，即苦心孤诣地修筑郢州城，说是累死的也不为过。李延寿在《南史·卷十八·列传第八》中对萧思话如是评价：“赵伦之、萧思话俱以外戚之亲，并接风云之会。言亲则在赵为密，论望则于萧为重。”这个评价相当高。萧思话镇守夏口的时间很短，郢州是他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站，但我们对于他任郢州刺史时的历史往事，却少有研究，甚至对于可“瞰临沔汉”的楼榭与黄鹤楼之间的关系，也无人涉及。这实在是蛇山史、黄鹤楼史，甚至是武汉史上的一件憾事。

萧衍攻破郢州城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郢州也不断更换主人。宋元徽五年（477年），年仅10岁的安城王刘准即位，是为宋顺帝。这个末代小皇帝在位仅两年，就被大臣萧道成逼迫让位。萧道成建立齐，同时接过了郢州的管辖权。永元三年（501年），雍州刺史萧衍和南康王萧宝融联手，兵发襄阳，又派王茂、萧颖兵临郢州城下，然久攻不破。无奈中，只得在郢城附近筑城堡，用屯兵围攻之法消耗城内兵力。这个城堡的城墙为土石结构，因是曹景宗所筑，被后世称为“曹公城”。《寰宇通志·卷五十》中载：曹公城“在府治东北二里，梁武帝起义兵，遣曹景宗筑水曲城，乃武帝攻郢城，又遣王世兴屯兵于此。”这个府治东北二里在哪里呢？大约在今小东门北侧小龟山脚下。



梁武帝萧衍画像

《武汉市志·文物志》对于雍州刺史萧衍在汉阳修筑的萧公城和梁废城都有记录，但却把曹公城遗忘了。这个遗忘非常遗憾，因为武昌城内出现两城对峙的局面，历史上仅此一次。两城对峙时期，齐王派出的救援郢州城的军队虽大败而归，但郢州城内的军队依靠坚固的城池，坚守了五个多月，至七月才军散城破，萧衍费尽周折才踏进郢州城。

萧衍攻破郢州城之前，郢州城已经异常惨烈了。原有文武官员及百姓“垂十万”人，因疾疫死去七八，城中积尸遍地，一片凄凉。据《梁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四十八》记载，萧衍攻克郢州城时，城内“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这场围城之战的惨烈，昭示的是郢州城内军民对齐王朝的忠心，对萧衍的痛恨。所以，把谁留下来进行善后治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来想去，萧衍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将军韦睿悲悯城中居民，“弃骐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自荐留下，领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组织力量抚恤生者、掩埋死者，使“百姓赖之”，城内渐渐安定下来。

中兴二年（502年）四月，萧衍领兵到

达建康(今南京)。此时,与其联手的萧宝融已经登基,是为齐和帝。萧衍拥兵自重,想夺位自立,其弟荆州刺史萧秀得其意,便派人四处传播童谣“行中水,为天子”,以此逼迫萧宝融让位。大兵压境,萧宝融只得推贤让位,齐朝灭亡,萧衍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梁武帝夺得齐朝天下后,派人给萧宝融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

从刘宋至唐初,历数百年,郢州城经大小十数次敌兵围攻,始终坚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结构,才能让城垣始终坚固呢?

1983年,重建黄鹤楼时,在蛇山掘出一古城垣的横断面,经堪测,它在蛇山山脊长300余米,与康熙《江夏县志》中所记“薄砖结砌”“墙基坚好”的夏口城相似。考古人员对其进行鉴定,发现该城相比夏口城有所发展,墙体虽为夯土结构,但墙面利用夹板,中间填土,层层夯实,直到顶部,再用薄砖结砌。且所用砖为唐以前建筑使用的长方体石料,因表面有类似绳子的装饰纹样被称为绳文砖,其中还夹杂为数不少的汉砖。专家由此断定,这就是郢州城遗址。这种建筑结构称为“版筑”,用版筑而成的城垣,“城基坚好”,可见其构筑时确实“工用缜密”。

因为郢州城坚固高大,防御性能很强,刘宋之后的齐、梁、陈各朝,均将郢州治所设于郢州城。这个武汉最古老的城垣之一,也是武汉第一次成为帝都的城垣。

今天,黄鹤楼景区内,当年的郢州城遗址前有介绍牌,文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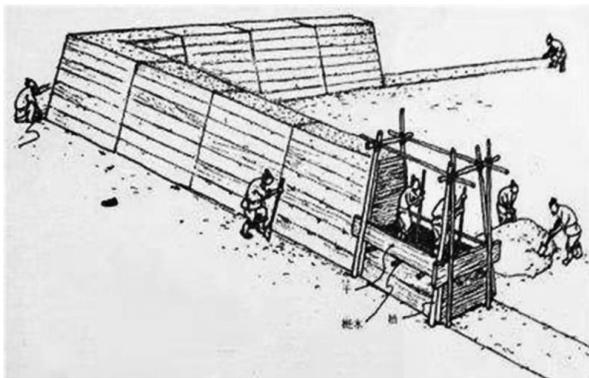
郢州城亦称郢城,位于武汉市武昌蛇山,南朝刘宋就三国孙权所建夏口城扩建而成,为其所置郢州州治。宋孝建元年(454年),孝武帝刘骏把荆、湘、江、豫4州中

的8郡划出设置郢州,以削弱方镇势力,郢州州治即设在夏口城内。

萧庄郢州登帝位

郢州成为帝都,必须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北齐的名将王琳(526—573年)。王琳是会稽郡山阴县(今绍兴)人,他和郢州有着天然的缘分。在纷乱的南北朝时期,王琳对萧梁忠心耿耿。梁太清二年(548年),萧梁将领侯景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次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将梁武帝活活饿死。历史上称为侯景之乱。侯景之乱爆发后,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让宜州(宜都)刺史王琳跟随王僧辩平定叛乱。

大宝二年(551年),侯景部将宋子仙占据郢州,王琳跟随王僧辩向东进攻侯景。四月间,侯景率军对王僧辩与王琳所在的巴陵城(今湖南岳阳)进行反包围,并派王琳的兄长王珣到巴陵城下劝降王琳。王琳对着城下喊道:“兄长奉命讨伐贼人,不能以身殉难,竟然不知内疚,反而要来诱我投降!”说完举起弓箭就射,王珣惭愧退回。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对萧梁的忠心,王琳和王僧辩终于在六月攻克郢州,擒获宋子仙。承圣元年



版筑墙示意图

(552年)三月,侯景之乱平定,王琳官拜湘州刺史。

太平二年(557年),萧梁任命的扬州刺史陈霸先起兵叛乱,攻下建康,梁敬帝萧方智被迫禅位,陈霸先自立为帝,建立陈政权。陈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姓氏为国号的政权,取代了五十六年历六帝的萧梁王朝。但是,梁并未全绝,还有一口气,永嘉王萧庄作为质子还住在北齐,王琳便视其为复梁的希望。

萧庄是梁元帝萧绎的孙子,萧庄的父亲萧方等是萧绎的长子。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封萧方等为湘东世子,可惜年纪轻轻就兵败而死。梁元帝登基后,追谥萧方等为武烈太子,封孙子萧庄为永嘉王。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陷江陵,梁元帝遇害。当时,年仅7岁的萧庄逃离了危险并藏匿于民家,是王琳找到他并安全护送回建康。承圣四年(555年),萧庄的九叔萧方智登基后,将他送往北齐作为人质。

陈霸先称帝后,王琳的部下还掌控着郢州城。陈霸先遂派出将军侯安都围攻郢州。王琳闻讯率大军从湘州急达沌口,据守东岸,准备迎战侯安都。侯安都也匆忙撤围,率兵至沌口,据守西岸;两军相持,互相窥



萧庄绘像

探。数日后正式交战,王琳乘坐平肩輿(古代的一种轿子)上阵,执钺(形如板斧)指挥,侯安都全军覆没。战后,王琳把湘州军府迁至郢州城,苦练水兵,意欲和陈霸先争夺长江中游的控制权。

天启元年(558年)正月,王琳把军队练成了一支“勤王之师”。遂向北齐求援,要求送还质子永嘉王萧庄,立其为梁朝皇帝。作为交换,王琳派出亲侄王叔宝,让其率所统辖十个州的刺史子弟前往北齐作为人质。二月,在北齐军队的护送下,萧庄平安到达郢州城登基,是为梁思帝。

萧庄以郢州城为帝城,使郢州城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隋书·五行志·下》如是记载:“陈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时王琳立萧庄于郢州。”梁思帝延续梁朝国祚,改年号天启,命王琳总管梁朝军国大事,任职侍中、使持节、大将军、中书监,改封安成郡公,势力范围在长江中上游地区。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王琳败于陈朝将军侯瑱,加之北周又趁火打劫,攻占郢州城,王琳只得护着萧庄逃亡北齐,萧庄三个年头的帝业就此终结。北齐封萧庄为梁王,承诺为他复兴梁朝。但北齐实力不济,于承光元年(577年)被北周灭亡,萧庄在怨愤中被北周暗害,年仅30岁,谥号烈宗。清代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中评价:“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

在兵家必争的战乱年代,蛇山也书写了一页“帝都”的历史。

战乱中出现的黄鹤楼

笔者见到的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上的黄鹤楼,就是在这个战乱的年代中。《南

史·卷五十二·安成康王秀传》以及《黄鹤山志》，都记录了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发生的故事。笔者曾写有《读志札记》，也对这则故事进行了转述：

南北朝时，夏口一带为军事要冲，战争不断。黄鹤楼下“露骸积骨”。安成康王萧秀到此后，见此情景，便着人祭之，并将积骨埋于地下。入夜，安成康王睡梦中，见数百人到面前，跪谢后飘然而去。

安成康王萧秀是梁武帝的弟弟，因喜好才士、重视士人，成为梁朝的贤达之人。正因为如此，他从荆州刺史改任郢州刺史，才会“埋积骨于地下”。又据《梁书·萧秀传》记载：“每冬月，常作襦裤以赐冻者。”在郢州，每到冬季，萧秀都会赠送衣裤给受冻之人。他镇郢州三年，离开郢州时，郢州百姓主动相送至州境上。后来，萧秀患病，郢州百姓闻之，纷纷为其请命。萧秀病逝后，郢州百姓“裂裳为白帽”，戴孝哀哭。能赢得百姓如此爱戴，堪称遗爱在民的好官啊。

从萧秀黄鹤楼下埋骨一事可知，因为在江夏山发生的战事太多，山间多有就地掩埋的阵亡者墓地。《黄鹤山志》另有一则记载，讲述了江夏山间也有一些比较考究的墓地存在。比如，有关宋英中治平年间，武昌县令郑前观的一个梦境。

宋英中治平年间，武昌县令郑前观感觉身体不适，欲小睡。进入寝室，见一老人穿古装、戴古帽走上前来，给他作揖。并告诉他：煮地骨皮汤喝下，小疾可愈。

郑县令对老人说：从没见过你，不知为何来此？老人答：西汉时期，我和你一同为官。现在你再次投胎，二世为人，我还在阴间“留滞”。郑县令遂问其名氏，老人答：我乃将军何复。你如果想见我，可到费家园来。老者告别前，吟诗一首：与子相逢西汉

年，半成枯骨半成烟。欲知土室长眠处，门有青松涧有泉。

郑县令惊觉，乃知一梦。不久，郑县令游头陀寺，行至江夏山下的城小路，见树木森然，遂问寺僧，此为何处？僧答：费家园也！郑县令进入费家园，园中有小道，旁有残碑，碑字漫漶难识，唯有“何复”二字可辨。坟前有涧水，栽有老松数株。

这种鬼异故事并不可信，但其中有一个信息可信，这就是江夏山上有历史久远的墓园！所以，安成康王萧秀埋数百骨骸于江夏山是有依据的。

萧秀埋骨的黄鹤楼下，会在矶石之上吗？可能性几乎没有，唯有山坡有土壤之处才可埋数百“积骨”，然历史久远，此埋骨之处无处可寻，致具体地点无法考证。这则消息很是让人郁闷，因为第一次看见黄鹤楼在古籍上出现，竟然是与几百个战死者的“积骨”联系在一起的。蛇山作为军事要冲、黄鹤楼作为军事用途，其最初的面目真真的与山川风月、玉宇琼楼没有一点点的联系啊！

自刘宋以后，齐、梁、陈一直以郢州城为郢州州治。隋置鄂州，设江夏县，鄂州州治和江夏县治都设在郢州城内。此后，鄂州、郢州的名称虽几经变更，但州治却一直稳稳的立在郢州城内。

唐敬宗宝历(825—827年)年间，牛僧儒出任武昌军节度使，驻鄂州，改用陶甃筑城，经5年扩筑成鄂州城，城垣至五代还未废除。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再次扩建武昌城，武昌城基本定型。

董玉梅，武汉地方志专家，武汉文史馆馆员

金口槐山访名胜

◇ 刘谦定

槐山也称“槐山矶”，位于今天江夏金口的长江之滨，亦名大槐山、淮山、鸡翅山、惊矶山，与长江北岸的大军山遥相对峙，形成了著名的“长江锁钥”之一。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的《江夏县志》记载：“大槐山在县南七十五里，晋李大槐隐居于此，故称槐山。初祖始入中国，折苇渡江即此，后人建亭塑像以祀之。”另据《湖北通志》引《太平寰宇记》中所述：“槐山又名惊矶山，西南俯临大江，下有石矶，波涛迅急，商旅惊骇，故名。”

槐山其实不高，因峻奇临江似金鸡俯瞰铁板洲，又曾拥有达摩亭与西华观等佛、道古迹而“有仙则名”，自古以来就是骚人墨客争相游行之地，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战场。

槐山矶驳岸

槐山矶驳岸，位于槐山西麓长江边，雄峙长江之滨，控扼金水之口。驳岸造型气

势磅礴，蔚为壮观，技艺精湛，朴实耐用，是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大型水利和船运工程建筑之一。

2013年3月5日，槐山矶驳岸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口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镇，它也是长江中下游著名的水陆码头，自古就是江南非常重要的货物贸易集散地。槐山矶距离金口约1000米，因槐突兀江边，悬崖峭立，暗礁密布，漩流湍急，行船至此难以上行与停靠，并随时有遭遇颠覆沉船的危险。因此，当地官府和百姓共襄善举，兴建了可供帆船安全航行与停靠、方便纤夫拉纤的石造驳岸，同时也预防了山体被江水冲刷而崩塌。

槐山矶驳岸全长247米，平均高度7米，最高处9.3米，分为三层台阶依山就势而筑。底层台阶的平均高度3米左右，宽2米至2.3米；中层台阶高2.3米，宽2米至2.3米；顶层台阶高2.3米，宽5米左右。三层台阶即为三层纤道，纤夫行走宛如坦途。



槐山矶驳岸（何海威摄）

驳岸壁上有若干牛鼻式穿缆石孔，方便船工撑篙系缆。在中、底两层的中部，还各有券顶式圆拱涵洞1个，高2米，深10余米，上下连通并有踏步，既供人们在需要时通行，又随时可泄山洪。底层长约400米，中层稍短，顶层临江面还装有石质栏杆，全长226.3米。栏杆之间按等距离立有金瓜顶方形望柱，高0.6米，宽0.25米，共计130根。部分金瓜顶方形望柱还配有抱鼓石163件，望柱中间嵌有长方形整块花岗岩栏板，每块栏板宽1.5米，高0.4米，共计129块。

相传，驳岸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无疑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宏伟工程。由于笔者孤陋寡闻，手头资料有限，至今还没见到驳岸到底建于何时的有效实证。也有传说驳岸是由一群丈夫已溺水身亡的寡妇筹集资金而建，是为了避免船工、纤夫等再在这水流湍急之处遇险，所以当地人又称这里为“寡妇矶”或“寡妇矶驳岸”。但据实地观察，驳岸三层台阶纤道所铺的条石磨损面都比较严重，说明了早年该驳岸的使用非常频繁，逆水上行的船只也非常之多，纤夫的步履痕迹至今清晰可见。驳

岸全长两百多米，用于这项工程的花岗岩条形石和红砂石块数以万计，如此浩繁艰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竟由一群民间寡妇集资所建。

清光绪七年（1881年）至八年（1882年），湖北提刑按察使司与武昌府江夏县，分别在驳岸顶层竖立了有关航行使用事项的“示禁碑”。据史料记载，在清道光年间与民国

早期，地方当局曾对驳岸进行过维修。

1954年长江发特大洪水时，因抢修江堤致使驳岸的南北两端局部有所损毁，1997年和2001年，有关方面对驳岸的主体建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维护修缮。

纵览驳岸，临江雄起，大气恢宏，建造精良，坚固实用，它展示了古代人民独树一帜的胆略与智慧。在切实保护好它的前提下，似应古为今用，使其真正成为举世瞩目的“古今长江第一观景台”。

留云亭

槐山之上，隋、唐建有一座达摩亭，亭中供奉着汉传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塑像，相传“西域达摩辞别梁武帝折一苇渡江处”，当年就发生在这座亭子下方的长江边。

古籍《梁记》记载：“达摩为南天竺王子，姓舍帝利，泛海广州。梁武帝萧衍遣使迎至金陵（今南京）与之谈佛，不相契合，故折苇渡江入魏。”达摩的名字原本叫菩提多罗，成年后依照习俗更名为达摩多罗，后又改名为“菩提达摩”，他是印度禅宗第二十七代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

祖师般若多罗尊者的大弟子，之后成为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

达摩一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们得知梁武帝笃信佛教，于是首先就去找梁武帝谈佛论道。达摩信奉的是禅宗大乘佛教，普度众生。而梁武帝信奉的是小乘佛教，主张自我修行。由于修持途径的不同，他们在谈论佛法佛事时，当然话不投机，达摩感到非久留之地，便主动告辞梁武帝萧衍，在梁大通元年（527年）十月十九日渡江北上入魏。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达摩到达洛阳，下榻在嵩山少林寺，从此开始面壁九年，人们管他叫“壁观婆罗门。”

达摩在中国始传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谓“不立文字”的意思就是脱离文字的禅，认为语言和文字只是描述万事万物的代号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并不识字，却能通晓佛

法，只要明心见性，了解自己的心性，就可以成佛。

达摩之后，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高僧弘传，禅宗终于一花开五叶，分成为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等俗称的五家。其实，达摩渡江时那棵一花开五叶的芦苇就已预示。所以，禅宗之后发展成了汉传佛教的最大门派，广大信众尊奉达摩为汉传佛教的禅宗初祖，尊奉嵩山少林寺为禅宗祖庭。

早年间，从槐山达摩亭遥望迴峰山，可见山上有座迴峰寺，该寺珍藏有达摩写的一首偈：“峭石凌空浪拍天，槐山依旧锁风烟。回头二十年前事，哪得功夫上钓船。”相传达摩写毕，他等不及钓船到来，便折一苇渡江入魏。正是这首“达摩碣”，后来被当地人演绎成了西域达摩折一苇渡江处的重要凭证，以此证明达摩渡江处就发生在槐山与迴峰山之间的江边，“迴峰落雁”亦被载入了金口八景之一。

槐山达摩亭最后被毁于元末兵燹。明代道教盛行，达摩崇拜也已降温，当时人们都认为，达摩祖师一苇渡江处在南京城外



驳岸上的石雕金瓜望柱与抱鼓石（何海威摄）



留云亭与满月门（何海威摄）

幕府山的夹骡峰下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江对岸的长芦禅寺内还保存有古老的“一苇堂”。

因此，明代金口的乡绅邑人，在槐山达摩亭遗址上重建了新亭后，便通情达理将新亭更名成为“留云亭”，寓意此亭与武昌黄鹤楼有关。明代画家沈石田为此还写有《吟留云亭》诗：“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常在水潺潺。如何一霎神仙事，却望千门草舍间。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早含山。征帆劲棹游人过，飞鸟渐倦去未还。”

清顺治（1644—1661年）年间，金口名士段灿（又名段以融），在任衡山县训导官时，出资将槐山留云亭修葺一新，并题诗：“昔有黄鹤在汝南，城迁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亭春秋，白云千载留槐山。”

但到了晚清太平天国时，这座明代的留云亭可惜被毁于战火。

1924年，金口的乡绅耆宿萧禹虔、萧泽如、安春林、赵衡斋、邱德昭、韩谦亨等人捐资，在毁于战火的留云亭遗址上又重建

了一座留云亭。此亭今位于槐山顶上偏东，坐北朝南，两层六方砖木结构，亭高15米，径长9.6米，采用六根圆柱撑起六坡水重檐，斗角飞翘，灵动壮观，宝顶配鱼鳞瓦，古色古香。正立面有竖式额匾，上写有草书“留云亭”三个大字，额匾面对着护亭花墙正中开设的“满月门”，迎接前来“寻幽碧落外，此境真洞天”的八方游客。如果沿留云亭再漫

步西行，则绿树掩映，曲径通幽，至西端就来到了“古望江楼”遗址，此处放眼，江山如画，风景绝佳。

虽然，达摩亭在明代就已更名为“留云亭”了，但金口民间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在讲达摩渡江的故事，并坚信达摩折一苇渡江处就是在槐山下的江边。现在，江夏金口一带仍然还流传有“三月三、游槐山、拜佛祖、保平安”的民谣与习俗。

千年银杏树

槐山南坡，生长着雌雄一对千年银杏树，犹如精神矍铄的老者，虽缄默无言，却阅历了古往今来的兴衰与荣辱。

历史上，槐山是吸引善男信女前来朝拜的香火兴旺之地。据史料记载，隋、唐就出现了纪念佛教禅宗达摩初祖的“达摩亭”和道教上清派的“西华观”。

唐朝初期，李氏皇室特别优待道教，唐高祖将道教列于三教之先，目的是攀附成

老子后裔为政治手段来维护其统治地位。李氏皇室原本出身鲜卑军户，非名门望族，李渊父子起兵争夺天下时，必须要找到一个望族来撑门面。因道教祖师老子原本姓李，被信众尊奉为“太上老君”，于是，李氏皇室便大力宣传说自己就是太上老君的后代，代表大道治理天下，这样不仅撑了门面，也增强了自身军事征战的合法性，因此，道教迎来了辉煌盛世。



槐山南坡的两颗千年银杏树（何海威摄）

唐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以替太子祈福为由，兴建西华观和普光寺，并请秦英任西华观观主，这是唐代在都城长安兴建的第一座道观。《长安志》记载：“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敕道士秦英祈祷获愈，遂立此观。”随后，道士秦英的门徒配合跟风的地方官，在各地又相继建了一批“西华观”，槐山的西华观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历史上，槐山西华观虽屡毁屡建，该观秉持的道教宗派也常变更，但它在香火鼎盛时，相传常住道长有四百多位。令人遗憾的是，槐山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西华观，最后被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晚清“同光中兴”期间，有高僧发愿化缘筹资建庙，在西华观遗址上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大的“淮（槐）山寺”，只可惜该寺在二十世纪中叶被折毁，时至今日，游客在两棵千年银杏树北边的半山腰处，还能在该寺的废墟上见到一些清代的残砖烂瓦。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公孙树，有树中活化石之称谓。相传槐山的这两棵千年银杏树，乃是唐贞观年间（627—649年）的高道所植，当年应该是西华观大殿前面的风水

宝树。千百年来，此树虽历经天灾雷火与人间战火，至今仍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现树高20多米，直径约2米多，需要几个人手牵手才能将树干合围。

据文旅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这两棵银杏树是武汉市中环线以内，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活体树木，比汉阳凤凰巷那棵著名的古银杏树还要年长几百岁，现已列为“一级保护植物”。为此，笔者竭诚呼吁，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这弥足珍贵的千年古银杏，将其冠名为武汉市“第一长寿树”，同时也把槐山的古迹名胜进行整合与适当复建，真正使槐山景点能成为公众可以亲近的公共旅游度假胜地。

刘谦定，武汉市文史馆特约研究员

“魏清记”营造建筑经典

◇ 王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武汉城市近代化方兴未艾的时期，也是武汉近代建筑发展的兴盛期。来自上海的魏清记营造厂投入武汉城市建设热潮，兴建了汉口电话局、太古洋行、花旗银行、江汉关、亚细亚火油公司等一大批优秀建筑，以精湛的技艺和卓越的质量成就了武汉建筑业中诸多经典之作，在武汉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名震上海滩

魏清记营造厂的创办者魏清涛（1854—1932），浙江余姚人。1843年上海开埠后，城市建设一派繁忙，建筑市场需求很大，吸引江浙一带水木工匠纷至沓来，承接工程，谋求生计。魏清涛祖上即来上海开办魏清记木行，经营木业。

魏清涛早年到上海习木匠手艺，后承祖业继任魏清记木行经理。开埠通商后，上

海跃升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城市近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上海的建筑劳务、建材、工程承揽市场机制渐趋成熟，一些水木作头们在承建上海租界建筑的历练中成长起来。在完成资本积累后，为适应建筑市场的变化，也为了满足新建筑复杂的施工工艺要求，开始告别作坊式经营模式，转而开办营造厂承接建筑业务。其中浙江绍兴帮和宁波帮捷足先登，成为上海建筑业不可或缺的生力军。远见卓识的魏清涛看好上海建筑市场前景，也紧跟时代潮流，于19世纪末独资创办魏清记营造厂。

营造厂的出现，改变了水木作坊规模不大、承接工程小的生产模式，标志着代表更先进施工技术与组织方式的近代建筑业时代的来临。但从传统工匠作业转型到近代建筑施工阶段，不仅要掌握西方先进营造技术，而且要熟知经营管理之道。

魏清涛深知中西建筑业的差异与距离，勇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大胆尝试创新，在

他的主导下，魏清记营造厂着力提升施工技术，拓展建筑营造业务，不仅配备专业的施工队伍，另请专人从事运营管理，其实力已可承包规模大且技术复杂的建筑工程。

清末民初，上海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为营造业提供了发展空间。魏清记营造厂抓住这难得机遇，兴建了江海关二期工程、上海永安公司、商务印书馆、西侨青年会和青年协会大楼等一大批标志性建筑物。这些建筑施工要求高，难度大，如商务印书馆主体工程为四层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建筑功能复杂，平屋面、钢门窗，具有近代先进工业技术水平。魏清记营造厂知难而上，迎接新技术挑战，高质量完成作业；西侨青年会建筑外立面要用面砖拼镶图案，为确保面砖拼镶整齐划一，魏清涛挑选最好的泥工，不惜工时细模细作。竣工后的西侨青年会美轮美奂，宛如一件雕琢而出的工艺品。

魏清记营造厂凭借良好的行业口碑和



太古洋行大楼

过硬的施工质量，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建筑市场闯出一片天地，一举成为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营造商。魏清涛也由此成为上海建筑业绍兴帮代表人物。

魏清涛为人慷慨，乐于结交同业，共谋事业发展。1897年，魏清涛等在上海捐资重修水木业敬祖师爷鲁班的场所——鲁班殿，也是同业的公所。之后，又摒弃地域偏见和门户之见，说服绍兴同业与上海浦东帮同业实行联合，于1907年成立沪绍水木工业公所。1921年，魏清涛与同乡工商巨擘发起创设中央信托公司，任董事。并历任浙绍公所董事，绍兴旅沪同乡会董事、副会长，上海总商会多届会员。因热心社会公益，魏清涛还被推选为中国救济妇孺会董事。

上海是中国近代营造业的发源地，因聚集营造、设计、技术等多方面人才资源，在全国建筑行业独占翘楚。眼见上海建筑市场趋于饱和，发迹于上海的建筑厂商纷纷以上海为跳板，开拓国内外市场，武汉成为主要目标。

进军大汉口

1861年汉口开埠后，外商外资接踵而至，划租界，设洋行，办工厂，武汉由内陆商品集散地逐渐演变为国际化通商口岸，城市近代化建设帷幕就此开启。一时之间，汉口租界区大兴土木，宽阔规整的街道街区蔚然兴起，欧陆风情的西式建筑相继涌现。

建造西式建筑工程的营造厂，最初由外国人经营，新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艺引入武汉，使武汉近代建筑业应运而生，但本土建筑业仍以传统水木作坊形式运作。上海营造商掌握着先进施工工艺和经营方式，在溯江而上转战武汉过程中，主动出击开设营造

厂，发掘潜在建筑市场承揽工程。

1898年周昆裕建立明昌裕木厂，武汉第一家华人营造厂自此诞生。1908年沈祝三创办汉协盛营造厂，比明昌裕发展更为迅速，一跃而为武汉营造业的魁首。有感于武汉市场前景广阔，1914年魏清涛在汉开设魏清记营造厂汉口分厂，该厂成为上海较早赴外埠发展的营造厂之一。

为了打开建筑市场，魏清涛选派骨干驻扎汉口，调研市场行情动向，摸清本地地质及石材、黄沙、水泥产地情况，因地制宜开拓业务。汉口电话局大楼，是魏清记进军汉口的第一个大项目。大楼建成于1915年，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呈四方形，入口置于正中，四根古典式立柱分列两侧。外墙仿麻石粉刷，辅以横向线槽、砖砌花饰。三层饰以水平腰线，临街设有出挑阳台。屋檐正中立有一个三角形牌面，檐口女儿墙富于变化。整栋大楼并无过多繁杂的装饰，简洁明快，为古典主义向现代风格过渡的造型。尽管总建筑面积达9729平方米，不仅规模大，而且设半地下室，施工技术难度高，但魏清记营造厂勇于迎接挑战，严抓工程各个环节，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在汉口建筑市场站稳脚跟，开创新局。

魏清记营造厂一炮打响后，一个又一个工程订单如雪片飞来。1918年，魏清记营造厂将原两层太古洋行大楼改建为四层。大楼位于汉口沿江大道，砖混结构，各层全为外廊构筑，红瓦四坡屋顶。外墙部分采用红砖清水墙面与大面积麻石面，华丽而不失庄重。一楼主入口为一长方体形凸出门厅，以两根罗马立柱支撑。门斗顶上设计成露台。主立面第一、三层长廊为拱窗间隔，第二、四层则为方窗间隔；二、三层窗户间墙



花旗银行大楼

体是方形立柱造型，四楼窗间墙体又是方形双立柱造型，增添了建筑立面古典的三段式构图效果。属文艺复兴式建筑，颇具欧洲中世纪古朴之风。

1921年，由景明洋行设计、魏清记营造厂承建的美商花旗银行大楼落成。大楼坐落沿江大道青岛路口，高29.5米，建筑面积6153平方米，钢混结构，地上五层，地下一层。主立面三段式构图，左右对称，比例严谨。一层中部入口采用凸出门斗，以四根爱奥尼克柱支撑。二至四层贯通八根爱奥尼克立柱，形成柱廊。五楼为平顶。楼顶有女儿墙，中间墙面有石塑1921字样，表明建筑年代。立柱和檐口带少许装饰。整栋建筑呈正立方体，线条简洁，形式庄重，属于简化的古典主义风格。

承建江汉关

在魏清记营造厂建设的诸多工程项目中，江汉关大楼无疑是建筑体量最大、施工难度最高的一栋建筑。

江汉关由英国建筑工程师辛浦生设计，土方工程由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开设的刘

歆记填土公司承揽。1921年江汉关大楼主体工程公开招标，将设计图纸、施工程序、承包契约、造价工期等内容张榜公告，魏清记、汉协盛、杨祥记、周顺记、姚宁记等8家营造厂参与投标。它们均为建筑行业中的佼佼者，甚至不乏汉协盛这样的营造业巨头，招标竞争十分激烈。评标结果公布，龚之记报价最高，竣工期最长；而魏清记报价最低，竣工期最短。魏清涛不谋巨额利润，报价公道合理，加之承建的建筑工程效率高、质量好，信用可靠，因而一举中标。1923年1月，魏清记营造厂动建大楼主体工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精心选用建筑材料，于1924年1月按期保质建成大楼。

江汉关大楼位于沿江大道与江汉路交会处，占地1499平方米，建筑面积4009平方米，兼具希腊古典式与欧洲文艺复兴式建



江汉关大楼

筑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下一层，地上四层，钟楼四层，总高度46.3米，跃居当时武汉最高建筑。大楼主面采用三段构图古典手法，以钟楼为中心对称构图，外墙用花岗石砌筑，大楼东、南、北三面均有花岗石廊柱，坚固壮观。巍然耸立的钟楼独树一帜，每日按时敲钟，按刻奏乐，声音洪亮可达三镇。大楼内部设备装潢都从国外进口，力求美观实用。整座建筑气势恢宏，庄重典雅，一经落成即为万众瞩目的城市地标，也是当时堪称国际顶尖水准的建筑，魏清记营造厂技术之先进、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

江汉关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武汉著名文史专家徐明庭撰文回忆，浙江同乡兼同行非常重视乡谊，彼此团结协作互相支持。魏清记接下了江汉关工程，由于工程量浩大，宁波人钟延生率领的一支施工队伍“帮了魏清记一把”。钟延生之后任职于魏清记营造厂，并于1925年在汉口创办钟恒记营造厂，兴建了德士古洋行、安利英洋行、大孚银行、延庆里、东山里等一批建筑。

创新“亚细亚”

进入20世纪20年代，建筑科学有了长足发展。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筑新思潮、新学说的大量出现，建筑学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建筑风格逐渐由新古典主义转向现代主义，满足时代需求、与工业化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主义建筑在武汉兴起。魏清记营造厂把握了这股建筑思潮的演变，也开始承建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以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最具代表性。

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由景明洋行建筑师海明斯设计，魏清记营造厂承包施工，包价纹钱40万两，1924年动建，1925年竣工。原设计8层，实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大楼设计布局结合地形，平面为不规则矩形，转角处则作弧形处理，自由铺展开来。立面构图仍按三段式手法划分，入口为凹进门斗，上方有出檐，两边有巴洛克托座。二、三层有挑出阳台，饰以精美石雕包；仿麻石的外墙面，檐口用线脚装饰，外观简洁典雅，可谓汉口早期现代建筑中的代表作。大厅满铺灰白色大理石，室内用高档木料石材装修，富丽堂皇。供电、供暖、卫浴、电梯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功能合理而实用。为力求设计、施工、装修的精益求精，对于工程的建设及材料的选用，外籍工程师及华籍助手陈方友严格按照承包合同监督施工，工程质量稍有欠缺即行返工或换料，以致建材耗资巨大。魏清记营造厂不但未获盈利，反而亏空不少，多亏亚细亚火油公司汉口买办涂堃山和南昌买办傅绍庭出面调解，最终由亚细亚火油公司补偿纹银20万两。

魏清记营造厂承接亚细亚公司大楼亏本，得益于涂堃山、傅绍庭的斡旋之力而获补偿，故特意为两人各建相同式样西式住宅一栋，以示酬谢。两栋小楼均为三层砖木结构，建筑主立面对称构图，中间四根立柱撑起凸出门斗，门斗顶上为带宝瓶石栏的阳台。二层两侧窗户有三角形窗楣。三楼中部窗户为圆弧拱窗。檐口中间设三角形山花。屋顶为四坡红瓦覆盖，每面开老虎窗。涂堃山、傅绍庭公馆建成于1926年前后，比邻而立于汉口黎黄陂路上，自成街道一景。

汉口开埠后，随着武汉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大量人口的涌入，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里分开始出现。里分，西方低

层联排式住宅和中国传统四合院式建筑的结合体，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产物。在里分建设大潮中，武汉不少知名营造厂投资建房成里。

魏清记营造厂建成的清仁里，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东段六合路与陈怀民路之间，长60米，里内皆板壁平房。据1926年《汉口商业一览》记载，魏清记营造厂就位于清仁里28号，时任经理钟延生。令人遗憾的是，清仁里今已不复存在，魏清记营造厂厂址终难寻觅。此外，魏清记营造厂还承办汉口造纸厂机器房、水塔地基及美孚石油公司储油库等建筑业务。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也是凝固的历史。魏清记营造厂一手打造的建筑精品，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建筑水准与工匠精神。从建筑结构上看，这些建筑多有采用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三至六层，体量宏大，气势不凡，坚实耐用；从建筑风格上看，古典主义、文艺复兴式、现代派建筑异彩纷呈，造型雅致，装饰精美；从建筑类别上看，金融建筑、洋行建筑、工业建筑、别墅里分等种类繁多，各擅胜场，不一而足。

历经百年风雨侵蚀，这些近代历史建筑依然结构坚固，轮廓清晰，形态典雅，风韵犹存，至今仍为武汉城市建筑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它们见证了魏清记营造厂曾经的辉煌与成就，为武汉城市空间构造了极富魅力的建筑文化景观，并沉淀为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钢，武汉图书馆馆员、地方文献室负责人